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 《记忆》313期

### 【思想文化】

中共实施的第二次国家现代化（1949—1979）

——中国百年的三次现代化进程（二）/楚天江

### 【百年中国】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简史（2）（1967年1月-12月）/阎保定 陈沾纬

4. 毛主席检阅和红卫兵大串连

5. 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

6. “军民协力，制止武斗”与“八五”静坐

画说我的一生（17）/ 刘海鸥

——庙小神灵大（上）（1968）

### 【人物】

另类“红二代”——知天命者李飞飞/石名岗

蒯大富魔窟中的贾春旺/陈楚三

### 【述往】

1949—1959：我在南京党政机关工作/盛天任

迺兹府的众生相/张保和（美）

### 【序跋】

《周恩来要我批陈云》作者自序

——我只记述亲历文革的这点事/敖本立

附：《周恩来要我批陈云》目录

### 【读者来信】

1. 续霜红：清华出的文革书很多，但没有资料集

2. 任富田：质疑《吴忠将军口述》中的一个细节

【思想文化】

## 中共实施的第二次国家现代化（1949—1979）

### ——中国百年的三次现代化进程（二）

楚天江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全会相当于是共产党中国现代化纲领和进城宣言。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确定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建设的蓝图，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全会着重讨论了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为实现这个转移，全会号召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任务，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注意，是争取知识分子，已将知识分子的界线划得很清楚），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人，尤其要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从理论上预见问题是一回事，在实际上解决问题则要难得多。随后的历史马上就验证了这一点。

1949年的大决战，中华民国随着蒋介石败走台湾。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基本上阐述了共产党对未来的建国纲领，明确宣布：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要建立的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在这一年的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应该说，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最初具有西方议会制的雏形，这并非共产党的初衷，而更多的是从统战角度的考虑，以达到吸引社会知识分子、精英人士参与其中的目的。参加这次政协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共六百多人。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关于政权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

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政府形式：“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经济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展示了新中国建国纲领的基本框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前，它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直到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这也是1908年以来中国颁布的第九部宪法。

1949年建立的新政权带着明显的革命特征，其最大的特点是“穷人的政权”：首先，是全新的城市管理者的出现。当他们进城之时，确实是一贫如洗，最大的财产就是手里的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共产党带枪来到城市，因为政权的维护也离不开枪杆子，维护和保持政权成了执政党的首要任务。

第二，部分阶级的被消灭和被改造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1949年以前，在共产党根据地和活动范围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已经在部分地区消灭了地主阶级。解放后，全国范围（台、港、澳除外）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最终完全消灭了广大农村地区地主阶级（有些已从肉体上消灭）。随之而来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半强迫、半自愿的赎买政策使1949年选择留在大陆的城市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失去对资产和财富的控制权，有的甚至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总体来说，对民族资本家的态度要温和一些，虽也有过激的行为，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清洗运动。民族资本家在“保命”还是“保财”的现实面前，大都选择了前者。作为中国社会的夹心阶层，中国旧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旧中国，他们不敢说衣食无忧，内心的优越感还是存在的。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里，他们发现，缺乏革命的积极性和斗争性，与旧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心理上优越感正在慢慢变成心理负担，他们甚至为自己缺乏坚定的革命性感到愧疚。而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则使知识阶层沦为改造的对象，成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一个社会群体。

第三，新政权很快就出现一个新权贵阶层，共产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及其家属，享受较高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特权。他们以公有制

的形式，占有并享受着被推翻的统治阶级的大部分物质财富。北京及各大城市中王公贵族、前国民党政府高官及民族资本家的花园别墅早已悄悄地换了主人。

第四，中国工人阶级是比较特殊的群体，在马列主义的理论中，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工人阶级一直保持着理论上的领导、实践中缺席的尴尬地位。共产党历史上以搞工人运动起家的领袖人物如张国焘、刘少奇也并非真正的产业工人，而是职业革命家。建国后共产党提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是因为工业化的建设需求。革命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从武装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产业工人，此时工人阶级地位开始明显提升。

第五，最明显的是农民地位的变化。1949年以前农民是暴力革命主要力量，是革命队伍的主要来源，农民的参与决定了革命的成败。但革命胜利并非意味大规模城市化，部分有文化基础的农民战士进入城市，开始适应城市生活，部分战士最后被边缘化，再次回归农民。“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sup>1</sup>

按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工人阶级应该是坚定的革命者和领导者。但是在中国，革命理论到具体实践有着较大的差异，这使得革命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均感困惑。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发展阶段，按共产主义的革命纲领来看，并不准备和农民结合。早期革命的重点在中心城市，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工人阶级主导的起义和罢工、市民参与的罢市均归于失败。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真正产业工人出身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之后很快就叛变了革命。由于他身居高位，掌握大量核心机密，给共产党的组织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史上，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情形，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党内地位也是几上几下、游离不定。始创初期，因为社会影响力和语言文字（外语）的优势，在理论和宣传方面占尽先机，来自大学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导革命的进程，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制定。

当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苏共始终试图控制远东地区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的组织，鉴于中共的弱小和苏共的强势，来自斯大林身边的留苏派掌握了话语权。随着共产国际的影响力减弱和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留苏派如王明、博古等，面对

<sup>1</sup> 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389页，华夏出版社，1987。

中国革命复杂形势和农民运动的特点，甚至在苏共的理论和马列教科书上找不到答案，感到无所适从，力不从心。经过党内反复较量和残酷斗争之后，最后核心权力归于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知识派和农民精英派结盟，开始主导了革命的进程。二十多年的地下革命实践和经验(依靠广大农民取得胜利)，决定新政府不可能依靠旧中国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旧政权留下的专业管理人员人数不多，由于阶级立场不同、思想意识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也不可能赢得新政权的信赖。

中国共产党作为地下党时间太长，和早年城市革命的失败教训，以致无法和城市知识分子建立信任关系。多年战斗在穷山恶水赤贫地区，共产党的思想武器是阶级分析来确定革命的敌人和盟友，阶级的划分主要是以物质财富为标准，其次是对革命的态度，所以对财富政治上的恐惧导致对城市经济的陌生。革命基层队伍以农民和文盲为主体，经过多年战争生活的干部队伍无法适应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这并非中国革命独有的问题，因为革命者和建设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身份，其中的转换是十分艰难的。按萨缪尔森的观点，“没有系统学习过经济学的人，甚至没有足够的条件来考虑国家事务。”<sup>1</sup>

长期的武装斗争使共产党既不熟悉国家经济运行体制，也没有储备相应的经济管理干部人才。当然，如果干部不能适应管理体系，体系就会去适应干部，最终只能依靠农民干部（军队干部）来管理城市，或者用管理军队的方式来管理国家。建国初期，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大量的军事词汇，如集中建设叫“大会战”，完成任务叫“拿下高地”，科技研究叫“攻坚战”，开会叫“战前动员”，保证书叫“军令状”，就是因为共产党干部队伍对军事词汇更加熟悉。70年后的今天，改革开放40年后，我们不时还能再主流媒体上听到熟悉的军事词汇。2020年的开春，电视上天天出现“打赢抗击新冠肺炎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全国脱贫攻坚战”！虽然有近40年没有打过仗了，但军事词汇并没有远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冷战的大幕又缓缓拉开。美国和苏联——这一对战争中产生的超级军事大国，从共同抗击德国纳粹之后，就再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和平相处，尽管也没有面对面刀兵相见。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基于对世界领导权及世界资源的争夺，双方展开全方位的军备竞赛，试图用它们的影响力控制整个世界，从而达到“不战而屈

<sup>1</sup> 萨缪尔森著，高鸿业译：《经济学》上册，8页，商务印书馆，1988。

人之兵”。与以往大国对抗不同的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双方都避免直接作战，都在他国挑起间接的战争。因为两国直接冲突意味着有可能爆发全面核战争——人类毁灭的危险，双方在心照不宣的情况下形成了冷战的态势。冷战改变了军事联盟的格局，美国与西欧国家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而作为对抗，苏联则将大多数东欧国家集结在一起，共同组建了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作为共同防御性实体。这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如果遭受攻击，则视为对整个组织的挑衅，该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将立刻针对挑战国，发动最严厉的反击。

由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剑拔弩张，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政权的建立，迫使中国只能再次走向封闭。中国隔绝了与西方——并不是整个西方，而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别无选择地投入了社会主义阵营领袖苏联的怀抱。两个富于专制传统的国家结盟，就像两只刺猬抱在一起，抱得越紧，就越有可能伤害对方。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运动中，过分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致使遭受巨大的挫折和损失。后来毛泽东按自己对社会革命和中国历史的理解，终于找到了武装革命的制胜之道。在取得全国政权开始国家工业化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参照，只能依照苏联的发展模式，依赖苏联的援助，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而苏联社会的发展模式，本身就是西方现代化的变种，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另一条道路，虽然取得了快速工业化的巨大成就，本身带着无法消去的缺陷基因。这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现代化之路不是平坦的。

如果说国民党主导第一次国家现代化，是在清王朝大殿基础上改造、扩建、翻修，因为私有制是他们共同的社会基础，那么，由共产党主导的第二次国家现代化，则是打破一切旧的社会基础，将中华民国全部推倒重建。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又影响到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在农村消灭了地主阶级，在城市消灭了工商业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唯一结果就是大一统的公有经济的出现。但是国、共两次现代化也有相同之处，如都由官方主导，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国民党时代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不断遭到挤压，共产党时代民间资本则完全被消灭，并且两者不约而同地，都是从重工业入手。

然而，共产党是以农民和军人为主体推进的国家现代化，其中包含着中国革命的悖论。革命的性质是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文化和反传统，本质上是反智

的。由产生于叛逆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家来领导，革命队伍以农民为主体，但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某种程度上又必须靠知识和知识分子来实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派和极左思想始终是十分顽固而强大的势力。他们天生的反文化倾向，对革命队伍中和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控制和镇压达到极致，包括精神上的摧残到肉体上消灭。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到1957年“反右”，最终在60年代主导了中国革命，演变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发展大倒退，也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最终给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常说旧中国“一穷二白”“一张白纸”。旧中国贫穷落后是真，但“一张白纸”却并非事实。可能是因为毛泽东长年战斗在井冈山、延安等赤贫地区，对中国上海、武汉、广州的经济发展无从了解。前面介绍，1927年至1937年间，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大批民族企业、企业家及企业品牌，民族资本家在艰难的环境中，创立了一批优质的工业产品，甚至挫败称霸一时的同类洋货。如上海“火柴大王”的刘鸿生的火柴、“灯泡大王”胡西园的灯泡、“皂药双料大王”项松茂的香皂、“烟草大王”简氏兄弟的卷烟、苏州荣氏家族的面粉和布匹、“化工大王”范旭东的化工产品、重庆的“船业大王”卢作孚的长江船队等。国民党政府抗日军队的主要装备，如枪支、弹药，并非依靠国际援助，而是中国自己生产的。这些民族企业在1953年开始的公私合营的浪潮中成为最初国有企业的基础。共产党推进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是如此的复杂和曲折，显示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艰难。中国暴力革命的过程已经包含了现代化的手段和目标相互背离。尽管如此，共产党还是在30年中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并且在重大科技项目和工业建设中，尤其是军事领域，如核导弹、核潜艇，航天发射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下面我们将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工业化进程，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介绍。

### 一、初理国政（1950—1956年）

新政权成立不久，中国被迫拖入了朝鲜战争，久经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借债出兵，和联合国打了一场战争，对国民经济的造成很大影响。随后，中国政府开始考虑恢复经济和实施工业化进程。第一步就是模仿苏联人做一个五年计划，因为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建设成就显著，举世震惊。1952年8月，周恩来率领由陈云、李富春及政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参加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



斯科，征询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并提出援助的要求。当中国学生拿着精心准备的计划向老师请教的时候，苏联人乐了，说你们这根本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苏联朋友表示愿意给予帮助，对《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周恩来和陈云在苏逗留期间，两次拜会了斯大林，并专就“一五”计划问题做了请教。斯大林指出，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指出，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老大哥毕竟有三十多年的建设经验，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在后来定型的计划中得到了采纳。

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对中国“一五”的意见。其要点是：“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权面对冷战环境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唯一的选择。1954年，中苏双方商定苏联援建中国项目达156个，称为“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从实际施工的150项看，军工企业有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中部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35个。

通过这156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中国工业畸重沿海的状态，建立起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实际上这种布局也是战争思维的结果。东北作为重点除了原有的工业基础好是因为靠近苏联，安排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工业项目，则完全是希望脱离台湾和美国（有朝一日开战）轰炸机的范围。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比如1953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援建项目的补偿。但苏联的援助确实是真诚的。他们动用人力、物力，帮助中方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建设。“一五”期间工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

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工业建设的强劲发展势头，表明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标志着中国工业化有了良好的开端。<sup>1</sup>

## 二、荒唐的“大跃进”（1957—1959年）

由于对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够，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经验不足，毛泽东等人在“一五计划”成果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疏远和破裂，让中国工业化进程失去老师的同时也失去了方向，共产党开始用指挥战争的方式指导经济建设，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1957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毛泽东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在既不了解英国、也不了解美国的情况下，提出要使中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毛泽东号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精神。会后，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翻番，作为实现“大跃进”的重要步骤，达到1070万吨。

“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近两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全国形成了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全国响应毛泽东号召，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炼钢。但由于设备、技术和原材料的缺失，最终炼出大量的废铁。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砍树，破坏了大量的森林资源和水土植被，引发日后的天灾。在大跃进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也形成了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不良风气。即使是到了今天，地方政府追求GDP高指标、重点工程赶工期、上项目拍脑袋瞎指挥甚至编造经济数据（每年各省上报的GDP总值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多出好几万亿），仍然屡禁不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根源就是“大跃

<sup>1</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上卷，284—301页。

进”的后遗症。庐山会议后期，由于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1958年“大跃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对工业、农业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随后的三年之中，说不清是天灾导致人祸，还是人祸引起天灾，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死亡人口达3600万之巨（根据杨继绳先生的著作《墓碑》），中国陷入一场巨大的灾难。毛泽东是农民（富农）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一个传统、勤劳而节俭的农民，一直要求喜好读书的儿子参与农业生产。毛泽东16岁才第一次走出地处深山的韶山冲，少年时期对农耕事务并不陌生。如果说对钢产量的追求源于他对工业化生产一无所知，那么“大跃进”中，全国农业产量“大放卫星”，最高的亩产已达到二十万斤。当我们看到毛泽东满面笑容视察高产田的时候，是长期的军事生涯使他遗忘了早年的农耕经验，还是他沉浸在虚假和谎言带来的满足感之中，或者是他明知是谎言而觉得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实在是不得而知。

### 三、折腾后的歇息（1960—1965年）

“大跃进”发动后，中共中央领导层对经济形势的认识并不统一。1959年4月2日至5日，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确定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8亿吨，粮食产量1.05万亿斤，棉花产量1亿担。由于会议制定的各项指标过高，以致许多单位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能摆脱“缺原料、等材料、无法正常工作的被动局面”。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主持了1958年统计数字的核实工作，国家统计局于1959年8月13日将核实结果报告了国家计委。其中粮食总产量由公报数的7500亿斤下降为5000亿斤，棉花总产量由公报的6638万担下降为4200万担，其他农产品产量也都经核实大幅度下降。但是，8月16日庐山会议闭幕之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9月，《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的社论，党内的分歧导致压缩高指标的努力中途夭折，“左”倾错误继续主导了经济工作。

1960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再次强调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但是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程度认识仍不同，1962年初，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认识才逐步一致。到了1962年4月，中央批转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以后，才对多年来基建战线过长的问题，认真着手解决。为了扭转“大跃进”失误带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中

国从1961年至1965年经历了五年国民经济调整。这是一次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城乡关系、经济体制的全方位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超过了历史上最好的1957年。按照1960年提出调整方针的最初设想，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1962年底结束，1963年转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1963年7月，中共中央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有了以前的教训，这次统一认识没有大的曲折，使以后三年的调整工作迅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sup>1</sup>

#### 四、文革时期（1966—1976年）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长达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指导经济发展方面导致严重的失误后，毛泽东的政治威信受到损害，他认为自己的权力也受到了削弱。为了重新获得以往的威信和权威，也为了打击和挫败政治上的对手（如果没有对手，就要制造一个对手），他的重心转到了思想和文化方面，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他认为自己更加擅长。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毛一生对经济并不感兴趣，他所领导最大的经济建设也就是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主要是种粮食、纺棉线和做服装，基本上是农业和手工业，和工业沾点边的是军火生产。但是他的国学底子深厚，喜好诗文和哲学，早年在北京十分关注新文化运动，并和其中的风云人物有过不对等的接触。当年胡适发表“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文章，毛泽东甚至给胡适写信，准备成立“问题研究会”。毛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并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通过运动来挽救在“大跃进”中受损的威信和按自己的意志来调整中国政坛的权力结构。刘少奇、周恩来对政府行政体系严密控制，使已感觉到大权旁落的危险。苏联出现的变化，尤其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背叛，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提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是他为自己的权力斗争找到最好的借口。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三反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次他想解决的问题在共产党内高层，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

<sup>1</sup>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上卷，284—301页。

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红卫兵异军突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带到各地，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基本陷入瘫痪状态，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全国大动乱局面开始形成。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最终死于非命。把刘少奇管理国家行政系统17年，说成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从1949年到1968年，毛一直是中共中央的实际领袖，也是中共中央的政策制定者。刘的倒台引发了官场强震，一大批干部受到牵连，轻则下放劳改，重则身陷囹圄。在打倒刘少奇之后，毛选择了林彪最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并将此写入党章。即便如此，毛无法改变猜疑之心和弄权之欲。很快，亲密战友分道扬镳，被迫出逃，最后客死异国。林彪出逃和死于非命，对毛心理上打击很大。1975年初，四届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不久，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结果是邓小平再次远离中国政治权力中心。

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但中国独特的体制保证了一系列科

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实际上也保证了工业化向前推进：如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的建成，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国民经济的成果，还不如说是国防经济的结晶。即使是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国防科研以其独特的重要性受到保护。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民众经常在十足的社会混乱和物资匮乏中，满怀激情地欢庆中国科技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遭遇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极左思想的荒谬性，当大部分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被强制性的脱离工作岗位，被批斗、被审查、被劳动改造，社会陷于混乱长达十年之久，证明了中国革命中极左派反文化和反现代化的本质，也显示了中国社会农业文明的特征。

1976年10月，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联合军队老帅叶剑英等，逮捕了极左派“四人帮”，标志着持续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政治上的结束（思想上并没有结束）。“四人帮”成了毛的替罪羊，但无论如何，将“四人帮”打成反党集团也不符合逻辑，因为“四人帮”本身就是共产党，他们只是坚定执行了毛的旨意。按现在的话来说，实际上是为了“甩锅”，从而减轻毛的负面影响。

## 五、革命的遗产

1979年，新中国成立30年。盘点历史和现状，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最大的成就，是化解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强硬的革命政权和军事工业的崛起，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尤其是和清朝的落后挨打、日本入侵的耻辱等相比，强硬的革命政权及好战斗勇的革命激情，更能给民众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自豪感。社会革命带来巨变，也为现代化推进打下了基础。和邻国印度相比，明显看出革命对社会变革的推动作用。印度和中国一样是文明古国，由于缺少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洗礼，虽然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政体，但沉重的历史负担和社会遗产，如种姓制、社会等级、贫富差距等，使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十分缓慢。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前30年，更关注社会结构、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变革。在其他社会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我们发现历史在探索中重复，就好像一个人在迷路的森林走了

很久，又回到原地。

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自己设计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场由农民主宰的工业现代化进程，主体大都出身农村地区，长期生活在落后山区和战争年代，他们熟悉战争，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生产方式一无所知。他们对国家经济建设的基本看法和管理经验来自1936年开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是在四周充满了敌对势力的封闭环境中，靠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满足自身最低的生存要求的军事管理模式。因此，先天注定这是一场只知道开始，不知道结尾的革命。由于战争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新中国直接开始重工业化，大力发展军事工业，这一点和晚清的“洋务运动”、国民党的现代化过程没有太大的区别。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建立以农业反哺工业，农村反哺城市的不合理社会结构。在新建立的公有制经济结构中，初期的经济平均主义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对劳动者的尊重，激起了广大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在国家建设中经常出现热火朝天、不计酬劳、无私奉献的场面。但是，由于政府使用非市场方式、人为地控制着分配机制，劳动者的收入和他的工作状态并非有很大的关联，要想长时间保持不计酬劳的劳动热情变得十分困难，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极大的压抑。人浮于事和低效率就成为公有制经济体系摆脱不掉的阴影。当60年代中期极左派主导了国家管理后，反文化、反理性倾向出现在每一个领域，经济建设成为政治革命的牺牲品。极左派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贫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裕”荒谬论调。建国之后以系列政治运动代替了国家管理，“土地改革”“四清”“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历史是残酷的，经过30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并没有按当初的设想发展进步，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倒退。尤其是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周边国家及地区横向比较之后，如南韩、台湾和香港地区，似乎更印证了这一结论。邓小平说过，1958年至1978年，国民经济虽有发展，但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让我们看看经济发展方面所走的反复之路：

第一，农业和农村。解放初期的土地革命在广大农村地区消灭了地主阶级，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民，运用暴力手段解决了社会财富再分配。中国农民经过短暂的意外之财的喜悦，并没有从此走上富裕的道路。由此证明把

中国农民的历史性贫困归咎于地主阶级的剥削是不公平的，至少是不完全公平的。用暴力手段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也造成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悖论：革命政府主导农村地区对地主阶级进行财产瓜分和肉体消灭，然后鼓励农民劳动致富，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地主了，地主的下场在农民心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极大的影响他们的劳动效率和对财富积累的热情。社会主义的前景，人民公社的公有制也无法解决低效率带来的贫困，土地集体化只是使剥削农民的主体由地主变成了国家。农村地区存在长期的贫困状况，使坚定的革命者感到痛心和迷惑，因为革命的目标产生了严重的背离。最后生存的压力迫使部分农民，以安徽小岗村农民为代表，冒着生命危险选择了经济上更为合理、效率更高的承包模式。1978年的中央召开“三中全会”，现实的困境迫使中央不得不改变了土地政策，土地通过承包的方式又回到农民手中。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下发文件，指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中国的土地政策完成了一个轮回。

第二，工商企业。1953年，中国政府开始了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逐步消灭了大陆所剩无几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企业家的工厂和产业收归国有。本来就十分弱小的私有经济犹如泥牛入海，消失在公有制的汪洋之中。随后建立的、大一统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具有粗放型和低效率的特点，消耗了无尽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30年后，无情的现实逼迫中国政府打破大一统的公有制天下，开始扶持个体户和民营企业的发展。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经过全面修改的宪法，确认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中国开始出现了建国后的第一代个体经济和个体从业人员，成为后来新中国民营经济的前身。前面我专门描述了3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的群体特点，50年后再次投身民营企业却以无业人员、劳改释放犯、农民、文盲为主，他们既没有文化也没有资本，他们的“资本”就是他们的力气和胆气，还有无奈，和30年代的民族资本家群体已无法相提并论。

第三，城市方面。1949年以前，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上海的金融业、



商业及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甚至超过日本的东京，是亚洲乃至世界一流的城市，上海人的生活水平高于香港。但是，经过 30 年的革命和闭关锁国，上海虽然保持了国内经济中心、第一大城市的位置，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从国际视野来看，上海完全沦落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到了 1976 年，上海是当时的中国内地最发达的城市，人均 GDP 只有 400 美元，而香港的人均 GDP 达到 7000 美元。上海尚且如此，武汉、天津、广州等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每一个革命者对权力的傲慢痛恨有加，但他们本身并没有逃脱中国历史上权力循环规律，也无法改变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的定律。权力的异化和官僚病产生了，利益集团和新权贵阶层掌握了大部分社会资源。虚假的公有制是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的关键。国家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长期分离，法律上财产归全体人民，而利益集团打着人民和公有的旗号，掌握国家财产的使用权，并利用权力贪婪地吞噬社会财富。此种社会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在苏联，或者说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异化。社会主义体制包含着本质的矛盾，集权管理需要集体主义和献身精神，但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需要人性的释放。回顾建国 30 年的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像一条没有罗盘的航船，虽然抵达港（工业化目标）很明确，但它的航线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更多的是一直向左，似乎从来就没有在正确的航道上，也许所谓正确的航道根本就不存在。和苏联一样，中国无法摆脱违反经济规律的后果，甚至比苏联更为严重。到 70 年代，极左派的控制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开始危及国家统治。贫穷的革命无以为继。

在 1949—1979 的 30 年间，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两次世界大战都起源于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让资本主义开始了深刻的反思。随着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大批民族国家的诞生，殖民时代已成过往烟云，帝国主义时代完成原始积累的方式（占领和掠夺）已不能适应世界发展趋势。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极左派控制，演变成为闹剧的时候，西方文明又发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它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涉及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

的变革,而且也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战后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体系的建立,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金融体系的变化,推动了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工业革命带来科技和信息时代的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再次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动力,经济总量取得了爆炸性增长。经济发展不再取决于对资源的占有,更多的是依靠科技的研发能力。战后美国成了独一无二的世界超级大国,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及日本也发展迅猛,就连二战后加入资本主义阵营的南韩、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也抓住了60年代信息时代的发展机遇,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增幅巨大,号称“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奇迹。在世界政治方面,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中,反思体制本身的缺陷,甚至开始吸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点,完成了从资本主义到福利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一点,是当初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领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实际上历史的发展更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始理论,即所谓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新的社会形态。由列宁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想跨越一个社会阶段,直接由半封建的农业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导致社会发展形成异化。

早期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引发了全球社会主义红色狂潮,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涌现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社会主义作为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取代了世界部分地区农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成为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思想武器,在两极世界中保持着和资本主义对抗的平衡。但是,革命的激情和欣喜很快就被随之而来的发展困境所湮没,毕竟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设想一重全新的社会制度。普遍的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本质和经济发展原始动力的矛盾,并且无法找到化解的方法。托克维尔说,“专制制度使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它妨碍人民发展生产,而不是它夺去人民的生产成果。”<sup>1</sup>苏联、东欧各国、中国、越南、北朝鲜、古巴等,每个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社会形态相去甚远,发展模式多种多样,但他们都面临同样的难题,那就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和效率低下,物质匮乏犹如噩梦无法摆脱,权力腐败现象日益严重,保持政权的成本和难

<sup>1</sup> 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237页,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

度在不断增加。即使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在实行铁腕工业化后，取得了非凡的建设成就，尤其在军事上，有了和美国抗衡的资本。但在辉煌和强盛的背后，也难以掩饰体制的痼疾和经济的虚弱。在寻找经济发展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探索中，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确实在考验和挑战全人类的智慧。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派和极左思想始终是十分顽固而强大的势力。他们天生的反文化倾向，对革命队伍中和社会上知识分子的控制和镇压达到极致，包括精神上的摧残到肉体上消灭。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到1957年“反右”，最终在60年代主导了中国革命，演变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社会发展大倒退，也使中国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最终给社会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百年中国】

##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简史（2）

（1967年1月-12月）

阎保定 陈沾纬

### 四、毛主席检阅和红卫兵大串连

1966年8月初，陕西各大专院校的省委工作团陆续撤离，很多师生冲破阻拦到交大等院校看大字报，了解动态，交流情况，称之为“串连”。后来，交大等院校师生又到工矿企业、党政机关、公检法、报社以及各县市去

串连，还在渭南、宝鸡、汉中等地成立联络站，宣传《十六条》精神，鼓励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

党中央和中央首长时刻关注着西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多次接见交大的师生代表。

1966年8月16日陕西省委门前的静坐示威发生后，交大校运动队派代表自费赴京反映情况，于8月22日到达北京。当晚，周总理在清华大学冒雨发表演讲，交大同学在演讲现场给总理递了纸条，总理看到后说：清华的同学，让西安交大和兰州大学的同学到前面来！清华的同学真的闪出一条小道人缝，交大同学

挤到前面，近距离看到敬爱的周总理，使他们终生难忘。交大赴京学生代表还参观了“人民日报社”，受到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接见。这是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第一次接见交大师生代表。

10月4日，西安交大全体师生（除少数留校外）集体乘火车赴京串连，并准备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接见。

10月14日晚上，西安地区革命师生员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张春桥到会讲话。

10月15日，周恩来总理、江青等中央首长接见了李世英。江青对李世英说：“你的材料我都看了，我们感到非常痛心。”“以后再别自杀了。”（详见李世英：《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永远跟着毛主席革命》《为有牺牲多壮志》文集，西安交通大学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委员会编，1967年3月）

10月18日凌晨4点，交大师生从清华大学按系和班级排队出发，先乘火车，下车后步行到农业展览馆前面东三环马路两旁，列队等候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的检阅。

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各乘一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六辆敞篷吉普车，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而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外大街、东三环路缓缓驶去，依次检阅红卫兵队伍。

13时许，当检阅车队经过交大队伍时，毛主席频频向交大师生挥手，师生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

10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毛主席第四次接见一百五十万革命小将》。《解放军报》第三版以《颗颗红心向太阳——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为题报道了这次接见活动。文中对西安交大李世英做了详细报道，真实地描述了李世英和西安交大革命师生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候的激动、兴奋的心情。（详见1966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10月20日，交大师生陆续乘列车返回西安。

从10月开始，交大大批师生到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连，也有许多师生下厂、下乡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宣传文化大革命。

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表扬步行两千里

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连海运学院“长征红卫队”。自此，全国各地掀起步行串连高潮。交大师生也积极响应，组织起“韶山红色长征队”、“瑞金挺进队”等步行串连队，有的向着延安、韶山、井冈山等革命圣地出发，有的重走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沿途散发毛主席语录，演出节目，参加劳动，宣传《十六条》精神，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受到沿途群众的热情赞扬。

从1966年11月到1967年初，西安交大先后有2500多师生徒步串连，还有很多下工厂、农村参加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

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院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所有在外地进行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在十二月二十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车、船不再实行免费。”

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联的统治》，要求在全国暂时停止长途步行串连，大串连运动遂告结束。

## 五、团结大多数，反对“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年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之类的极左口号开始在西安流行，一些造反派组织大搞“打、砸、抢、抄、抓”，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西安交通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在文革总会的领导下，旗帜鲜明地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1. 李世英的“三句半”和统指的“反右倾”

1966年9月的绝食结束后，“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逐渐得到大多数群众的认可，西安造反派逐渐成长壮大并最终掌握了运动的主动权。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在如何对待曾经“誓死保卫西北局”“誓死保卫陕西省委”的“保守派”群众，如何团结大多数等问题上，造反派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交大文革总会主任李世英认为：所谓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对“保守派”群众要帮助教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挤、压、砸”搞关门主义，要和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通过“谈判”消除分歧，共同对敌；要严格执行《十六条》提出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得到了交大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但统指中的西工大、西电、西大、陕师大等院校的领导人却极力反对，他们把李世英的观点归纳成“三句半”：“大方向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谈判！”从12月中旬起在各种场合

批判，说李世英和交大“右了”“修了”“与‘保皇派’搞折中、调和了！”等等，掀起了一场所谓的“反右倾”浪潮，还公开支持“打、砸、抢、抄、抓”的极端行为。虽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西安公路学院等大专院校的一部分负责同志不完全同意他们的主张，但统指的决策权已由西工大、西电、西大、陕师大等院校的领导人掌控，“反右倾”浪潮愈演愈烈。

1月15日，统指的某些领导人指挥他们的喉舌“东方红广播站”向全市广播批判李世英“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专题节目，提出“西安落后，西北落后，出路何在，坚决反右！”“大反右、大联合、大夺权！”把“反右倾”当作斗争大方向。由统指操纵的《革命造反报》从1月20日起，先后发表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必须彻底批判！》《打、砸、抢好得很！》《无产阶级革命派紧急动员！反右倾！大联合！大夺权！》等文章。“红造司”领导的《西安红卫兵报》还公然宣扬“革命的打、砸、抢万岁！”

1月19日，交大文革总会发表《牢牢掌握斗争的方向——西安市人民书》，号召：“师生员工深入工厂、农村，奔赴革命和生产第一线，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展开全面的夺权斗争。”

1月22日，交大文革总会再次发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再告西安市人民书》，针对统指大搞“反右倾”、煽动群众打“内战”、转移斗争目标、干扰斗争大方向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1月28日下午，统指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以李世英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大会”，交大队伍进场时与西工大等校发生冲突，有人被打伤，要求发言被拒绝，会议主持者将“文斗”变成“武斗”，把“反右倾”演变成为“打、砸、抢”行为。交大队伍中途退场，举行示威游行以示抗议。

针对统指内部出现的错误思潮，交大的李世英、沈荣水等多次在统指碰头会上摆事实、讲道理，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李世英还于12月16日在统指的讨论会上系统地阐述了交大的观点，发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呼吁，但是统指的一些领导人对交大文革总会的一片诚意和愿望置之不理。

同时，工联的领导人也违背广大基层工人群众的意愿，大反“右倾”，支持“打、砸、抢、抄、抓”，不同观点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事件不断发生。1月28日，西安庆华电器厂因夺权问题发生武斗，多人受伤；2月10日，西北光学仪器

厂在工联东郊二分会的操控下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破坏事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周恩来总理派调查组在西安调查，发现“西安二十几个厂子被砸”，调查组2月25日离开西安后的26、27、28日还有工厂被砸，西电在27日、28日连续派数百人去西安造纸厂打、砸、抢，并非法抓捕关押16名造纸厂职工。

针对统指内部出现的分歧，交大文革总会于12月12日召开了“402辩论会”。交大行政楼东侧四楼有一个W2号会议室，可容纳数百人，文革期间，这里就成了统一全校思想和行动的辩论会场。遇到重大问题，广播台就会广播“擦亮眼睛，准备战斗！”的歌曲，同学们听到歌声，就会自动聚集在行政楼402会议室及其周围就预定的议题展开辩论，广开言路，统一认识，这就是交大有名的“402辩论会”。

李世英在辩论会上谈了统指近一时期内部发生的分歧和自己的观点，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一致认同。总会组织各战斗队撰写文章，散发传单，派出宣传车、“红喇叭”小分队上街宣传。由53个战斗队组成的“大辩论串连会”到土门、纺织城等地的工人俱乐部演讲，宣传“十六条”精神和极左口号的危害性。所谓“红喇叭”就是交大师生在宣传车被反对派打砸的情况下，自己动手用硬纸板卷成纸喇叭上街向群众演讲宣传。

1月6日，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开会讨论通过了“反对打、砸、抢”的“八项声明”，并以《特别快报》的形式广为散发，《人民交大》报也连续发表《驳所谓“革命的打、砸、抢”》《“革命的打、砸、抢”能万岁吗？》等文章。总会还派遣一部分战斗队深入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宣传交大的观点，受到热烈欢迎。同时，广大师生员工还利用多种渠道了解西安的情况向总会反映，以便总会及时向党中央汇报，希望得到中央的支持。

## 2. 《二九呼吁》和工总司的成立

2月9日，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等二十九个群众组织在经过改组后的《革命造反报》上发表了最紧急呼吁，呼吁停止“反右倾”，指责“打、砸、抢”打的是阶级兄弟，砸的是群众组织，抢的是国家财产，是违背“十六条”的极“左”行为，并指出当前的斗争大方向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权斗争，而不是“反右倾”。

这就是在当时影响巨大的“二九呼吁”“二九呼吁”发出后，得到了西安广

大群众的支持和响应。但统指、工联少数负责人利用其操纵的“西安地区革命造反派夺权委员会”强令邮电局扣押已经印出的《革命造反报》，并“武装”接管“革命造反报社”，打伤报社职工多人。

2月18日，不愿跟随工联继续“反右倾”、搞“打、砸、抢”的陕西省纺织系统革命造反总部东郊联络站、西安铁路系统革命造反联合会（简称“西铁联”）、新华印刷厂文革筹委会等三百多个工人群众组织在西安市体育场召开大会，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

工总司成立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以主人翁的姿态大力宣传和支支持交大的正确主张，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文斗，反对武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抓革命，促生产，给西安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认可。后来，又有支持交大观点的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中革会等组织相继成立。

李世英和西安交大文革总会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在极其复杂困难的情况下力挽狂澜，旗帜鲜明地批判错误思潮，坚持正确对待不同观点的群众，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为维护西安地区形势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对西安乃至整个陕西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长远的、积极的影响。

### 3. 毛主席的《二一四批示》和周总理、中央首长接见

1967年1月底，中央文革电话通知西安统指办公室，要求统指派代表赴京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西安地区文化革命的情况。但统指的西大、陕师大的负责人却背着交大拟定了赴京代表名单，将交大排除在外，剥夺了交大的代表资格。

交大文革总会得知这一情况后，]月31日晚迅即派遣总会组织部长郑叔良、总会秘书吴翼健和红旗战斗队的王希平同学携带相关材料连夜赴京，由

交大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全力配合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三人抵京后，郑叔良立即组织吴翼健、王希平并在驻京联络处贺相等人的协助下快速写出汇报材料，制定了参与汇报的方法和策略。

2月2日，中央文革派西北组副组长到位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西安统指驻京办”召开情况汇报会。交大代表在会议即将开始时进入会场。尽管主持会议的西大代表百般阻挠交大代表发言，但交大代表沉着应对，终于在中央文革首长离席之际递交了汇报材料。



2月5日，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交大文革总会和持交大相同观点的西安医学院“八三一”的赴京代表。交大的郑叔良、吴翼健、王希平、贺相和交大文革总会驻京联络处的另外五位同志共九人参加了接见，西安医学院“八三一”有二人参加了接见。在接见过程中，陈毅副总理讲了“中国革命历程中犯过的‘打倒一切’的错误，‘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

“对革命干部也要允许他们改正错误”“西安高校的两派都要多做自我批评”等。最后，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对代表们讲：“毛主席在1月22日讲过，戴高帽子，下跪是对土豪劣绅的办法，不能用来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用来对人民内部……”。接见即将结束时，王希平代表交大革命师生员工向陈毅副总理献上了交大红卫兵袖章，陈毅副总理戴上袖章后爽朗地哈哈大笑，说：“好，交大，革命的交大！”当远在西安的交大师生员工听到陈毅副总理的这句话时，无不为之欢欣鼓舞！

2月7日，周总理秘书通知交大驻京代表，要求李世英来京汇报。经研究，交大文革总会决定派主任李世英、常委戴慕蓉、宣传部长张国强赴京。

2月8日，陈毅副总理接见交大和统指代表，进一步了解情况。

2月11日下午2时30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礼堂接见交大和统指代表，交大的李世英、戴慕蓉、郑叔良、张国强、吴翼健、王希平贺相等七人参加会见。总理进入会场后，亲切地和每个代表一一握手，并详细询问了每个代表的年龄、籍贯、家庭出身、工作职务及单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当得知交大只有\_个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总理说，“啊呀！全国仅有，是啊，这是独树一帜！”

2月13日下午6时10分到晚9时37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小会客室接如交大代表。总理详细地听取了李世英讲“三句半”的命过程和西安“反右倾”的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提问题，还询问了西安交大西迁的有关情况，同时谆谆教导交大代表要处理好两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

周总理、陈副总理在接见交大代表的同时，也多次接见了统指代表。就在中央首长频繁接见、准备解决双方的对立与分歧的时候，2月10日，西北光学仪器厂发生了严重的打、砸、抢事件。当天，陕西省军区打电报向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汇报，表明了支持交大，反对打、砸、抢的态度。但令

人不解的是：第二天，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又用电话向中央文革小组做了更正。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2月12日编印的《要事汇报》第八号上，登载了王明坤的电话请示报告。王明坤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编者注：正确名称应是“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成立了，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今晚开会发表’西安地区革命造反委员会声明’。”可以预料，如果王明坤的计划实现，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王明坤电话中的原则错误。2月14日，毛泽东在《要事汇报》第八号上批示道：“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毛主席的《二一四批示》对西安地区乃至整个陕西省的局势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毛主席对西安局势的关切，还体现在一段关于外国人大字报的批语上。1967年3月10日，西安外语学院的外籍教师大卫·库普贴出了一张题为《让我们治病救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有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明确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等，西安市外事办公室的高智（曾任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将这张大字报内容转呈毛主席。3月20日，毛主席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3月21日周总理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参见《周恩来年谱》）

五十一年后，交大应力21班戴克刚同学著文披露，这张大字报其实是他起草的，得到大卫·库普的认可并写成大字报发表，署名“大卫·库普”，这个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才为世人知晓。

3月1日晚9时到3月2日凌晨3时，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王力、戚本禹、穆欣接见西安交大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派赴京代表。

3月2日下午4时40分到7时55分，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接

见了西安交大和西安地区大专院校、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派赴京代表，21军军长胡炜、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坤、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刘镇和总后驻西安办事处的领导，西安地区部分驻京人员40余人及总理派驻西安调查组的同志参加了会见。在会见中，周总理多次严厉地批评“反右倾”是方向性错误！“打、砸、抢”是反动的，必须取缔、批判！指名让工联和统指的负责人依次表态，承认错误，做出检讨。总理还指出西安工总司的成立，是“由于统指和工联的反右倾和打、砸、抢的错误造成的。”周总理还说：各造反派组织“要抓整风、整顿组织来解决。夺权问题未解决要努力整风，准备夺权。整风要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学校以军训为主，工厂也可以由民兵军训。”周总理特意提醒交大代表：“你们不要骄傲起来，要欢迎他们的每一个进步，这样才能接近。”接见时总理还告知中央决定调胡炜任军长的21军到陕西支左，总理肯定了21军在山西支左工作做得很好，要求两派群众组织都要支持军队的工作。

至此，长达七十多天的“反右倾”落下帷幕。交大《六六通讯》《人民交大》报及交大广播台努力开展宣传，各战斗队也到各行各业传达周总理指示精神，交大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的观点更加深入人心，“打、砸、抢”和“武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 4. 努力整风，准备夺权

1967年3月3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陕西省军区、陆军21军、兰州军区空军及总后西安办事处四家共同组成“西安地区驻军支援左派统一指挥部”，又称为“陕西省支左委员会”，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21军军长胡炜、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杨焕民任指挥，袁克服、孙光、刘建功、方升普为成员。8日，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改称“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增王明坤、徐立树、苏锦章、刘江亭、白辛夫为指挥部成员。

3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中发[67]8号）要求：“下乡下厂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3月20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交大文革总会遵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召回了全部在外的师生员工。

3月15日至18日，“西安驻军支援无产阶级革命派统一指挥部”抽调省军区、兰州军区、兰州军区空军、21军等单位的干部、战士2059名，进入西安交

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电讯工程学院、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4所院校开展军训。

3月15日上午，西安交大在大操场举行热烈庆祝“西安组训革命师生第一师”成立大会。前来指导和帮助交大军训的解放军同志和组训第一师的万余名战士列队入场，首先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敬，接着校文革委员会主任李世英、解放军代表和学生代表讲话，最后大会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中闭幕。

军训遵照周总理“努力整风，准备夺权”的指示进行。为了加强纪律性进行了常规的队列训练，同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校文革总会成立了“临时整风小组”领导整风，全校师生对学校前一段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文革总会成员也主动开展自我批评，找西工大、西电等统指的领导人谈心。

3月29日，交大在大操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强烈控诉刘、邓反动路线对革命师生员工的残酷迫害，李世英、刘维娜、赵瑛、李群等先后发言。

4月3日，西工大文革委员会成员来交大座谈，交流军训经验。

4月17日，在交大大操场举行“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霍士廉、严克伦到场接受批判，参加大会的还有省委第二书记李瑞山、书记处书记肖纯等人。

4月19日，交大散发《再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三告西安全市人民书》，出动“红喇叭”宣传，师生到市郊张贴大字报。

1967年4月中旬，正值军训期间，陕西省驻军负责同志就“支左”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连续召开西安交大、西工大等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对支左问题的批评和建议。李世英在会上就军队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得到军队领导的认可和支持。有记者将此次座谈会以《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为题报告给中央，其中特别提到李世英的八条意见。1967年4月23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同时，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中，关于李世英有三处批注：

第一处，在《报告》中写道：“李世英同学对军区支左提出了八条意见”，

毛主席在“李世英同学”后面批注：“交通大学学生领袖，曾经被打成反革命，并几乎被迫死亡，后被救活者。”

第二处，在李世英第6条意见“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后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第三处，在第8条意见后批注：“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毛主席的《四二三》批示是对李世英同志和西安交大全体师生员工的赞许、鼓励和支持。

4月21日，交大师生冒雨开会，热烈欢送来校帮助和指导军训的亲人解放军，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宣告结束。

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67年初西安交大等四所高校成功开展的军训、整风和谈心活动，为不同意见群众组织之间弥合分歧、消除误会、增强团结做出了榜样。

## 六、“军民协力，制止武斗”与“八五”静坐

1967年4月，西安四大高校军训结束，统指内部两派的紧张关系有所改善，军民互动频繁，西安的形势总体向好，交大师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校内。

然而，正当交大师生专注校内斗批改，期盼早日“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西安社会上又刮起了一股新的打、砸、抢、抄、抓歪风，武斗事件不断发生，冲击和干扰着交大校内斗批改的进程，交大师生员工被迫应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

### 1. 交大革委会成立和第一次复课闹革命

军训结束后，交大于4月24日成立了“斗批改”办公室，各系成立“斗批改兵团”，文革总会开始部署校内斗批改。

4月30日晚，交大在大操场举行军民联欢会，8134、8133、8118等部队指战员应邀出席。

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8133部队和兰空的解放军同志五千余人参观了交大“东方红”展览馆，受到热情接待。

5月2日，曾在交大进行军训的8118部队解放军同志来校联欢，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

5月5日，黄经耀司令、胡炜军长及兰空首长召集交大22名代表座谈，询

问对大联合问题及支左问题的看法。

6月2日，交大召开批判彭康大会。

6月3日，交大召开批判林星大会。按照支左委员会支夏办公室要求，交大近五千人下乡支援夏收。

6月13日，交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李世英同志任组长。据统计，当时全校共有学生7055名，教职工2727名。

6月23日，武登才向全校师生介绍革委会筹备情况。

6月25日，交大召开全校辩论会，讨论成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如何节约闹革命。

6月26日，陈柏荣就节约闹革命与交大革委会筹备工作问题向全校作报告。

6月27日，西安外国语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因成立革委会问题发生争斗，倾向交大观点的一派组织“井冈山”前来请求声援。交大师生连续两天召开402辩论会，最后决定向支左委员会和中央反映交大的意见，但不出动队伍支援，不上街游行。这说明交大师生已经下定决心排除外界干扰，一心一意致力于校内斗批改。

7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经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委托兰州军区党委批准成立。当天在大操场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给毛主席发送了致敬信。

陕西省军区黄经耀司令员、袁克服政委、21军胡炜军长、兰州军区空军关盛志副政委、方升普副司令员等部队首长出席大会。

西安交大革委会发出（67）001号通告公布了革委会45名组成人员名单，其中：主任委员李世英（学生），第一副主任委员武登才（学生），副主任委员沈荣水（学生）、杨文（干部）、陈柏荣（教师）。

7月3日，交大革委会副主任武登才代表革委会就校内斗批改问题进行动员。

7月5日，交大革委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研究全体师生最关心的复课问题。

7月7日上午，交大在林场召开复课闹革命大会，李世英代表校革委会宣布：全校从今天起开始复课，进行“复课闹革命”。每天上午两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其余两小时学业务，下午、蛇学工、学农、拜，搞文化大革命。

7月19日，李世英及政治部负责人刘维娜就复课闹革命、掀起新的大批判高潮作动员报告。

但是，由于西安形势的变化，这次复课闹革命的计划没能实现。

7月26日，交大举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交流在复课闹革命中以毛泽东思想统帅革命大批判的经验和体会。

7月29日晚上，工总司、农总司等群众组织在交大的大操场召开革命领导干部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二百多名领导干部参加了大会，省市革命干部作了揭发与控诉发言。

8月1日，交大召开全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代会），李世英致开幕词，8118部队孙政委到会祝贺。

## 2. “军民联防，文攻武卫”与“军民协力，制止武斗”

交大校内斗批改和复课闹革命按计划进行，校外的形势却发生了剧烈变化。

工联领导层中的一些人在总理3月2日接见后，不但没有深刻认识错误，还把自己的失误归罪于西安工总司的成立。他们诬蔑工总司是“大杂烩”、“反革命小联合”等，甚至动辄对工总司各级组织实施打、砸、抢、抄、抓，工厂中的工联基层组织也在夺权中极力排挤工总司，频繁引起冲突。

4月27日，工联、红造司指使一些受蒙蔽群众七、八十人到工总司捣乱，从上午10点到夜里12点，围斗工作人员，砸烂办公室门窗，还绑架了三名人质。

1967年5月，武斗之风开始在全国蔓延。全国形势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西安，工联和工总司基层组织间的冲突逐渐升级成为武斗，并且愈演愈烈。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要求纠正当时出现的打、砸、抢、抄、抓歪风的《六六通令》。陕西省支左委员会贯彻落实不力，打、砸、抢行为依然横行，武斗仍在不断发生。

1967年5月31日，河南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火线指挥部”负责人袁庚华提出了“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导致河南武斗急剧升级，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周边地区。1967年6月中下旬，统指的西工大、西电等院校和工联把“文攻武卫”这一口号升级为“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广为宣传，同样加剧了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当时经常见到他们贴出的大标语：“军民联防，文攻武卫！”“21军好，21军好，21军支左不支保！”这些口号不仅把他们挑起的武斗合法化，还试图离间21军和交大、工总司的关系，但是，支左委员会却没有及时制止这些错误口号。

6月下旬，西安电力制造公司发生大规模武斗，工联的武斗队伍人人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用钢管制作的长矛，边走边呼口号：“军民联防，文攻武卫！”

6月25日，西安红旗机械厂“红总司”（工总）、“红旗总部”（工联）两派造反组织间发生武斗。

7月9日，西安红旗机械厂再次发生武斗。

7月13日下午，西安工总司、文总司等在新城广场联合召开批判霍士廉大会，文总司与对立派的文艺兵团、工农文艺总部等组织发生冲突。当晚，一伙人到文总司的所在地文化局打、砸、抢，当场打伤文总司30多人，重伤6人。

由于工总司基层组织的成员中，“党团员多，老工人多，技术骨干多”，所以在争斗中屡占下风，办公室被砸，负责人被抓，有家不能回，有厂不能进，有工不能上，越来越多的工总司基层工人只好流浪到交大暂住，教室被占，学生食堂不堪重负，校园秩序被打乱，引起了广大师生的极大关注。

7月20日至7月21日，交大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外事工作，由于“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肆虐，打、砸、抢和武斗升级，反击极左思潮的再次泛滥又成为当务之急，会议决定除杨文、陈柏荣外，包括李世英在内的其他委员全部抓外事工作，交大革委会被迫又将精力从校内转移到校外。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讲话中肯定了“文攻武卫”口号的正当性，次日，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了这个口号。但是，交大革委会多次讨论，一致认为“文攻武卫”与毛主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是对立的，“武卫”成了“武斗”的借口，所以，从来不组织师生参加社会上的所谓“武卫”。当“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出笼后，交大校内有的战斗队提出要“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革委会旗帜鲜明地接受、支持这一口号，安排一部分师生紧急中止校内工作，到工厂、机关、学校，配合工总司等基层组织进行宣传，西安的大街小巷、工厂车间几乎同时贴满了“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标语，使得“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很快失去了市场。“军民协力，制止武斗！”道出了西安广大市民的心声，同时也得到了省军区广大指战员的理解和支持。但支左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放任“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泛滥，不采取得力措施实施“军民协力，制止武斗！”导致交大和工总司的努力付诸东流！



### 3. “八五”静坐的始末缘由

交大和工总司大力宣传“军民协力，制止武斗！”西安的局面曾经一度缓和，但很快出现了反弹，更大范围的武斗事件接二连三发生，人们对西安局势的发展忧心忡忡，纷纷寄希望于陕西省支左委员会。

陕西省支左委员会由陕西省军区、21军、兰州空军和总后203部队四家组成，但是在领导班子里起主导作用的是21军。21军的军长是胡炜，周总理曾经介绍他是“又懂军事，又懂政治”，在山西支左工作做得好。胡炜到陕西支左初期也作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所以交大师生曾经给予他足够的支持和尊重。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交大和工总司的群众逐渐感觉到支左委员会在处理西安两派之间的矛盾时往往支持主张打、砸、抢的统指、工联一派，压制反对打、砸、抢的交大、工总司一派，更未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使得西安的形势不断恶化，辜负了周总理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

由于支左委员会在解决工矿企业两派群众组织的争斗中或明或暗地偏袒工联一方，成百上千被工联一方暴力驱赶、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反映情况、请求援助、讨要说法，但工人群众的呼声没有引起支左委员会的重视。

支左委员会在处理西安两派在“三结合”问题上的分歧时也有失公允。原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曾经在“反右倾”时选边站，公开表态支持西工大、工联一方，对交大、工总司恶言相向，中央明确表态后他又拒绝检讨，交大、工总司群众对他极度失望，但西工大、西电一方却要把霍士廉作为陕西省革委会首选的三结合对象。支左委员会不支持交大、工总司对霍士廉的批判，甚至不如实传达周总理对批判霍士廉的指示，进而默认统指派将霍士廉送往北京保护起来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两派的对立和交大、工总司群众对支左委员会的不满。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等报纸不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

7月27日，受“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工联所属数千人到陕西省军区静坐。

7月22日至7月31日，中央的报纸、杂志多次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及文章。交大革委会多次召集委员学习讨论，以李世英为首的大多数委员认为：针对陕西的情况，不同意搞“揪军内一小撮”，因为全国几乎瘫痪，军队是支柱，21军是周总理派来的，虽然他们支一方压一方，但这是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

误；也有少数委员认为这是中央的新动向，我们应紧跟中央。最后大家统一认识：不参与“揪军内一小撮”的行动，等待中央进一步的指示，并决定由陈柏荣按此精神向全校做广播讲话，动员大家认真学习社论，好好理解中央精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意外事件打乱了交大革委会的部署。

8月5日，武汉造反派组织“武汉钢二司”在西安出版了一份《武汉烽火》报，内容是“揪军内一小撮”，批判陕西省军区的“二月逆流”，也批判了交大。这份报纸在支左委员会军管的陕西日报社印出了几万份，并由21军的军车装运，交大师生对支左委员会和21军的做法感到不可思议。

8月5日下午，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派人到交大北门，交给门卫一份公函，并嘱其转交李世英后随即离开。李世英拿到公函拆开，发现是一份支左委员会发出的同意《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通知。这份通知签发时间是6月19日，时隔一个多月才送到交大。按照常规，这样重要的通知应该送达革委会办公室，但支左委员会却派人将通知轻率地交给了门卫。就这样，曾经因为鼓吹“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而被周总理勒令停刊的《西安红卫兵报》，居然在交大的强烈反对声中，由陕西省支左委员会于6月19日批准复刊，直到红卫兵报已经发行了，才极不负责任的通知交大李世英！

李世英和在场的革委会领导陈柏荣、戴慕蓉等考虑到当晚交大附中要成立革委会，为了稳妥起见，研究决定先不要向群众传达此事。当时在场的还有交大“大辩论串连会”负责人付登华，他对支左委员会的这种做法非常气愤，贴出了一张题为《胡炜必须悬崖勒猪》的大字报，披露了《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消息并发出了立即召开“402辩论会”的倡议。

当晚召开“402辩论会”，先由校革委会常委叶雄波主持，后来在部分同学的要求下改由付登华主持。辩论会上，付登华建议去找支左委员会反映要求、解决问题。十时多，他把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结为对支左委员会提出四点要求：立即军管刘澜涛、霍士廉等人；立即把刘澜涛、霍士廉等人交由革命群众批斗；不准《西安红卫兵报》单方面复刊；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等，并带领同学们出发前往位于西五路玉祥门省工会的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叶雄波跟着队伍行动。交大队伍到达支左委员会接待站后，发现人去楼空，连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有，支左委员会领导更是避而不见。无奈之下，付登华作为临时总指挥和叶雄波

等人商量后，决定再把队伍带到设在建国路8号张学良公馆的支左委员会联络站，继续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解决问题。6日早晨，队伍到达支左委员会联络站，发现也是人去楼空，于是就将队伍停在了建国路，伺机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和联络站的工作人员。5日晚，李世英到交大附中参加革委会成立大会，当得知“82辩论会”后付登华已带队伍前往支左委员会的情况，马上从交大附中赶回学校，急忙前去找交大队伍。

实际上在8月5日下午，得知《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消息，工总司已经组织了队伍前往支左委员会接待站抗议。当晚，工总司得知交大队伍出发的消息，立即又组织队伍支援。农总司、机总司、文总司等群众组织也来参加，抗议队伍的人数急速增加。

8月6日，参与抗议行动的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建国路8号开会，鉴于支左委员会领导不出面解决群众提出的问题，会议遂决定继续等待领导出面答复，并协商成立了以工总司马希圣为司令、交大李世英为政委的“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五’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八五”指挥部)领导该行动。由于连续几日未找见领导，队伍一直坚持未撤回，这次行动就演变成了静坐，后来人们称其为“八五”静坐。“八五”静坐的队伍主要分布在建国路附近，也有小规模队伍到位于西北局的支左委员会和位于陕西省委党校的21军军部驻地门前静坐，寻找支左委员会领导反映情况、解决问题。

李世英和武登才代表交大参与“八五”指挥部的领导工作。

“八五”指挥部成立后，随即发表了《造反声明》，向陕西省支左委员会提出了5条要求(大意)：

- (1)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立即继续军管刘澜涛，看管霍士廉；
- (2)立即将刘澜涛、王林、霍士廉交给革命造反派批斗；
- (3)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宣传通讯机构的规定，不准单方面复刊宗派主义的《西安红卫兵报》，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周总理关于军管陕西日报社的指示；
- (4)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
- (5)支左委员会必须对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作检讨。

8月7日，李世英在“八五”现场发表广播讲话，强调这次行动不是“揪军内一小撮”，而是对支左委员会“支一派，压一派”错误做法的抗议行动(大意)。

同日，21军刘政委建议“八五”指挥部撤回行动队伍，留下代表反映意见，但黄经耀、胡炜不出面，也拒不回应“五项要求”，所以“八五”指挥部没有接受刘政委的建议，认为“五项要求是合理的，首长不出来接见，不答复要求绝不收兵！”随后，行动的人数持续增加。8月11日，“八五”指挥部公布静坐单位799个，人数98000人，其中外地区组织90个，1900多人。

“八五”静坐发生之初，交大革委会多数委员就表示反对，后来又多次开会讨论，沈荣水、王春杰、郑叔良等多数委员主张尽快撤离，否则越来越被动。

8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西安问题的批示》（中发[67]242号）（也称“8·10明码电报”），电报中有关西北光学仪器厂2·10事件的内容如下：

“陕西省军区：对西北光学仪器厂2·10事件，根据国务院调查材料和陕西省军区复调查的材料，中央认为是一个破坏事件，定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把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应该予以平反，对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应该予以教育释放。2·10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各群众组织都应从中吸取教训，陕西省军区在处理2·10事件中是有错误的，但不是‘资本主义反革命逆流’，现在平反是对的，不是为‘打、砸、抢翻案’。”

陕西省军区宣布为2·10事件中被逮捕的罗有、王法法等人平反，只是取消了“反革命”的定性，“打、砸、抢”的罪行依然，而且是“教育释放”。可是，在统指和工联的策划下，被“教育释放”的罗有、王法法等六人却受到像英雄一样的欢迎，工联派车前去迎接，给他们带上大红花游行庆贺，助长了打、砸、抢分子的嚣张气焰。

“8·10明码电报”还指出：“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同志、二十一军军长胡炜同志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同志，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相信他们，如对他们有意见应实事求是地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

中央“8·10明码电报”传达后，21军刘政委提出要见李世英和马希圣，但胡炜和黄经耀还是不出面。刘政委说代表个人与李世英、马希圣谈心，但是李、马坚持要刘政委代表支左委员会，李、马代表“八五”指挥部，由于身份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而未谈成，错失了与支左委员会正面接触协商的机会。

8月中旬，沈荣水从武汉等地回来，向革委会介绍武汉及周围地区文革情况后，明确指出“八五”静坐必须马上撤掉，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揪军内一小撮”，多数委员也认为尽快撤出为好，但“八五”指挥部负责人仍然坚持等待支左委员会对五项要求的答复，否则绝不撤离。

自8月中旬起，参加“八五”静坐的交大队伍陆续返校，只有少数同学还留在“八五”指挥部工作。

统指和工联利用“八五”静坐制造摩擦、挑起冲突，自静坐开始起，他们就不断派人到现场挑衅，围攻、辱骂参加静坐的群众。

8月11日，统指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与工联、红造司和农总会结成武斗同盟，号称“四大组织”，为武斗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他们还在当地驻军的放任和暗中支持下，通过“明抢暗送”，从军火仓库、公安局等处获得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其中还包括部分制式武器，为武斗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一些被工联组织赶出工作单位、无家可归的工总司工人也失去了理智，他们不断冲击“八五”指挥部，要求马希圣和“八五”指挥部也要“文攻武卫”，工总司领导层中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人频繁活动，一些基层组织也在设法准备武器，大规模武斗一触即发。

8月21日，工联人员向西郊的西安变压器电炉厂的工总司发起攻击，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酿成血案。

同日，交大发表紧急呼吁：坚决反对武斗！愤怒谴责武斗！共同制止武斗！

8月22日，统指的矿院、财院、师大等校组织游行队伍到21军军部门前向静坐的群众示威、挑衅。

8月28日，工联人员向西安劳动技校开火，引发血案，学校被烧。

8月29日，西安胡家庙地区工联调动大批武装人员向西安筑路机械厂的工总司进攻，双方发生激烈武斗。

8月底，东郊的庆华厂、东方厂、华山厂，秦川厂；纺织城的国棉三厂、国棉五厂以及水泥制品厂也发生了武斗；外单位因武斗逃到交大避难的人数剧增。

8月31日，关中供电局发生大规模武斗，工联和工总司双方出动数千人，互有伤亡。

9月1日，四大组织通过设立在8133部队的拥军广播站，安排播出“揭露，

八五’指挥部打砸抢滔天罪行”专题节目，更加剧了两派的对立，也加剧了“八五”指挥部和支左委员会的矛盾。

同日，四大组织调动东方厂、华山厂、西铁总会、773部队和兴平的秦岭公司等全副武装的数千名武斗人员，包围了544厂、西安制药厂和西安红星钢厂，西工大、西电也派出队伍前去支援。工总司的刘安全率领数十辆卡车的工人前往西郊解围。

9月2日凌晨，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工联武装人员用机枪、步枪向工总司队伍扫射，当场打死数十人，伤数百人。武斗过程中，工联及西工大、西电一方亦有伤亡。这次武斗造成周边地区交通中断，机关、厂矿停工停产，损失十分严重。由于这次武斗发生在9月2日凌晨，故称为“九二武斗”。

9月3日，周恩来总理发出立即停止西安西郊武斗的指示，工总司、工联达成双方立即从武斗现场撤出的协议，武斗才告中止。

“八五”静坐的导火索始终是一个“谜团”，支左委员会明知交大坚决不同意，可为什么在“揪军内一小撮”风潮之时，突然把48天前就已经签发同意《西安红卫兵报》复刊的文件发给交大，这是一种轻率的、违背常理的方式。果不其然，看到这个文件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一群年轻人采取了轻率的举动原本是为了阻止宣传“打、砸、抢万岁！”的《西安红卫兵报》复刊，践行“军民协力，制止武斗！”的初衷，最后却事与愿违，由单纯的抗议行动发展成针对支左委员会的“静坐”，激化了交大和21军的矛盾，也使西安另一派推行“军民联防，文攻武卫！”口号有了借口，特别是“八五”指挥部没有及时撤离静坐队伍，更给对方激化两派矛盾、挑起武斗创造了条件，导致局势不断恶化，以致发生了数百人伤亡的“九二武斗”，给交大和西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八五”静坐问题上，交大和工总司一方应该深刻反思自己，认真从中汲取教训，同时也希望有一天相关档案解密，给出“谜团”的清晰答案。

#### 4. 大疏散决策与中央首长接见

8月中旬以后，西安武斗不断升级，陕工大的一些学生及东郊工联的一些工人多次用汽车撞击交大校门，毁坏西安交通大学的校牌，交大师生及过路群众和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一次次挫败了这些人企图挑起武斗的图谋。

9月1日西郊发生武斗后，四大组织就派出武装人员占领了和平门、东门和

交大周边的交通要道，和平门、东门都有武装人员把守并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遇到工总司和交大的人员就抓。和平门城墙垛口和东城门城楼上、兴庆公园、计量局、陕工大校门口和第八设计院大楼顶上都架设了机关枪，对交大师生实行武装封锁和武力威胁。

“九二武斗”发生前后，四大组织更是打着“军民联防”旗号，对交大进行武装挑衅，某部队院校的坦克碾压交大校园的篱笆墙，围着交大示威。在交大北门口，不时有四大组织的武装人员乘着大卡车呼喊叫骂进行挑衅，声称要“踏平交大，活捉李世英！”甚至策划绑架伤害交大革委会负责人，交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交大师生的安全也牵动着主持正义的西安广大工人、干部和市民群众的心。他们向交大通报四大组织武装包围交大的详情，为交大的安全出谋划策。就在武斗气氛最严重的9月2日、9月3日，就有西安市民冒着危险到交大报告了两起交大学生被西电、西工大劫持的情况，为营救这两位同学提供了关键线索。一些省、市老干部也建议交大疏散，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

9月3日下午，因得到消息称工联和统指要攻打并占领交大，校革委会在电机实验室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交大一贯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校内也没有武器，一旦对方进攻，我们绝无还手之力。为了全校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也为了校园、校舍免遭对方的攻打和破坏，决定采纳老干部们的建议，组织学生和教职员工立即离校疏散，返回原籍或投亲靠友，等待学校通知，有经济困难的学生还可以到财务处暂借路费。同时，留下少数骨干组织护校队护校。

护校队成立时，只有交大校武装部合法持有的几十支小口径步枪和有限数量的子弹，还有校实习工厂临时打造的几十把匕首，但他们不畏艰险，坚持护校。9月3日，有同学出于自卫考虑，到西安市莲湖区武装部联系用“明抢暗送”的方式“借枪”，可是莲湖区武装部刘吉尧政委（《智取华山》英雄，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等功臣）坚持原则，提前转移了枪支弹药，使前去的同学扑了空，实际上这也是爱护交大的做法。

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环境中，交大校革委会坚持不参与任何形式武斗的原则，果断作出了“大疏散”的正确决策，使交大避免了武斗的劫难！保护了交大，保

护了交大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

交大革委会在组织全校大疏散和护校工作的同时，还组织力量冒着危险调查九二武斗发生的过程、人员伤亡数据、工厂遭受的损失以及支左委员会制止武斗不力等情况，向中央反映。3日上午，校革委会派戴慕蓉携带相关材料随庆安公司工总司的负责人王焕如同乘飞机到北京直接向中央汇报。戴慕蓉到京后，通过交大驻京联络处与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的吴斌同志联系要求汇报，也找了中央文革西北组谭同志汇报。王焕如也通过三机部、国防工办系统向上级反映了情况。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即《九五命令》。

9月6日，吴斌通知交大驻京联络处，周总理叫交大、工总司代表去京，建议去京前把“八五”静坐撤回去。但是，“八五”指挥部没有执行总理的指示。

几天后，革委会决定派李世英、陈柏荣及段会林等人先后到京准备向中央汇报，带去了有关“九二武斗”的一批材料，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人支持武斗向四大组织暗送枪支弹药的统计表等，经过整理、核实后，连同一份省军区部分指战员写的关于“九二武斗”的调查报告一起上报给了吴斌及其他有关部门。等待接见期间，周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安排他们入住西苑宾馆，学习文件并等待中央首长接见。这样，撤离“八五”静坐的重任就落在了武登才的肩上。当时，支左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一直不出面解决问题，“八五”指挥部坚持得不到答复绝不撤离，双方陷入僵局，撤离工作非常难做。

李世英奉总理指示赴京后，于9月10日发出《给八五战士的一封信》。

9月11日，交大革委会召开会议，要求尽快撤离“八五”静坐。武登才向参加静坐的各总司作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9月13日，李世英在北京发出《给八五战友第二封信》，要求尽快结束静坐。

9月14日，“四大组织”在市体育场召开批判彭德怀、习仲勋、刘澜涛大会，会后游行并冲入“八五”静坐现场打、砸、抢。

9月15日，武登才在“八五”指挥部继续对各总司做工作，要求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尽快将人员撤离，为中央首长接见赴京人员创造条件。

9月16日，李世英从北京发出《给八五战友第三封信》，要求执行《九五命令》《六六通令》，撤离静坐队伍。武登才在各单位基层干部会上宣布决定：下午



17时结束静坐撤离现场。

从1967年8月5日深夜到9月16日下午，由《西安红卫兵报》非法复刊弓I起的大规模静坐示威活动持续了43天。

9月18日凌晨，周总理和康生、粟裕、邱会作接见了交大赴京代表李世英、沈荣水、陈柏荣、戴慕蓉和工总司赴京代表马希圣、崔三河。总理和康生谈到：把你们从西安叫来，单独和你们谈心是对你们的关心和爱护，你们是最早的造反派，不愿意你们走向迷途。总理还对交大和工总司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你们一开始就静坐，方法就不对。”“你们‘八五’一定受了北京的影响——揪军内一小撮。”“我们打了几次电话，总想给你们主动。你们现在派性高于一切，有私心。这次找你们来也是想让你们转入主动。”“叫你们来北京就是叫你们接触大问题，头脑要冷静。”还说：“你们6个人不能走，西安问题不是一次谈话就能解决得了的。”这让代表们十分感动。

周总理为了让交大、工总司的赴京代表们在接见后冷静地、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游，端正态度，回去在魅委员削导下两派联开始新的局面，亲自让秘书吴斌同志安排代表们在北京过国庆。代表们在西苑宾馆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讨论并如实整理总理、康生接见的记录，结合西安的形势讨论如何贯彻执行，并及时把学习的情况向吴斌同志汇报。期间经过吴斌同志同意，沈荣水在接见后回到西安，陈柏荣、戴慕蓉、崔三河三人国庆节回到西安，先行向交大武登才和工总司的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总理和康生接见的情况，国庆后又回到北京继续学习提高认识，等待下一首长的首接见。

11月2日晚上7时15分至12时，周总理、康生、张春桥、吴法宪、邱会作等中央首长接见陕西省军区、驻陕部队负责人和交大、工总司代表等四十余人。这次接见主要是解决协商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问题。周总理首先询问了交大、工总司代表这一个多月的学习体会，在严厉批评代表们对9月18日接见讲话精神没有正确理解，未从大局出发的同时，鼓励他们要学好毛泽东思想，脱离派性，“在主席思想指导下，以斗私批修为纲，搞好革命的大联合。”随后，代表们带着周总理的期望，肩负着中央的重托回到了西安。

11月5日，李世英、戴慕蓉向全校师生认真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康生两次接见交大和工总司代表的讲话精神。

11月11日,交大革委会作了自我批评,认真检查了在“八五”静坐问题上己方的错误和责任,还检查了“敌情观念不强”“放松了对校内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等问题。

周总理和中央首长的两次接见提高了交大、工总司代表们的思想认识,为实现西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成立陕西省和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 5. 护校行动

早在文革运动之初,社会上掀起了破四旧浪潮,许多学校的教学设备被砸,图书资料被烧,档案资料被抢。但是,交大文革总会和革委会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坚持保护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和图书、档案、资料,其中也包括后来的革委会会议记录、各种刊物等资料,反对以抢黑材料之名冲击档案室。

交大图书馆大门两侧有一男一女两尊雕塑精美的大学生塑像,充满了积极向上的青春活力,象征着交大人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全校师生都非常喜欢。文革初期,一些外单位的红卫兵把这两尊雕塑视为“四旧”,向上面泼墨,还非要砸毁不可。文革总会得到同学们的报告后连夜派人用三合板把塑像围起来,外面刷上油漆,写上毛主席语录,使得这两尊雕塑躲过了一劫,至今仍然屹立在图书馆门前。

九二武斗后,护校队和部分留校的师生在革委会的统一指挥下,在地下室、锅炉房、工程物理实验室等处隐藏学校的档案、图章、资料和贵重物资设备,还派专人保护图书馆的贵重图书资料室,完好地保护了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图书资料和档案,为以后的复课和文革结束后的教学、科研工作创造了条件。后来高教部有关人士多次指出,西安交大保护得这么好,这在全国高校中仅此一家。☐

【百年中国】

## 画说我的一生

——庙小神灵大（上）（1968）

刘海鸥



回到学校后得知我们这些代培老师要正式分配了，几个代培老师已经把城区学校的名额抢了先，留给我一个农村中学的名额，美其名曰“你不是一直要求上山下乡吗？把你分到农村中学，你满意了吧？”我一点也不满意，我向往的是边远的农村，绝不是北京郊区，但是已经没有讲价钱的余地，只好打点背包。

春节一过，我就去海淀区永丰中学报到，永丰中学在颐和园后面再往西北二十多里地的永丰屯，属永丰公社管。先坐111路无轨电车，在动物园换302路汽车，再在颐和园换上一个小时一趟的301路公交车。过了青龙桥后，沿着右边的京密引水渠经过左边的红山口、黑山扈（这里有一座望儿山，相传佘太君在此山头伫望被金兵掳走的四郎回家）向西北而行，过了西北旺，就是所谓的“山后”了。海淀的学校分为“山前”“山后”，山前学校的老师可以调往山后，但山后的老师没有特别关系就永远无望迈进山前，所以从理论上说永丰中学将是我一辈子的归宿。再往西坐几站，在一个叫做“屯佃大桥”的地方下车。所谓的大桥是一

个横跨京密引水渠的单薄的水泥桥。过了桥向北还要在一条公路上步行十里地，再往东走1里地，就是永丰中学了。

家在“山前”的老师都得住校以便参加早晚的政治学习，星期六下了课才能回家。坐车连换带等带走路大约需要两个半小时，下了车，天已黑，在阑珊的灯火中总能看见妈妈在汽车站焦急等待的身影。



那时候的冬天没有什么温室效应，彻人心肺地冷。换了三次车人已冻僵。下车后手脚生疼麻木，一步也挪不动。好在过了屯佃大桥有一个马厩，里面有一个饲养员的小屋子，很多马车夫和农民坐在里面烤火。冻得实在没办法，我便一头闯进去，问马夫：“大叔大爷，我能不能烤烤火。”他们不在意地说声：“进来吧。”从炕上给我腾出一个坐位。屋子里混合着马厩的臊味，干草料的香味，烧柴和抽烟的呛味。农民们穿着黑棉袄，絛裆棉裤，双手拢着，坐在炕上扯闲。他们并不理会我或装着对我的存在不感兴趣，继续聊他们的，偶然头也不回地问一句“小学老师？”当我的脚由生疼变为酥麻，又变成热辣辣时，我就继续上路了。





如果骑车上班，冬春天是个严峻的考验，冬天几乎每星期一都遭遇强烈的西北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冷风在南口的狭窄处加快了速度，尖啸着，强劲地插入永丰地带。如果天气预报四五级北风，那里必有七八级。上班的路正好顶风，自行车根本骑不动，风会连人带车吹倒在地，只能推着车走，弯着腰，头顶着风，踉踉跄跄，几乎走不动。密密集集的砂石扑面而来，如尖锐的钉子把脸打得生疼。不愿回到学校的心情和与北风搏斗的沮丧正相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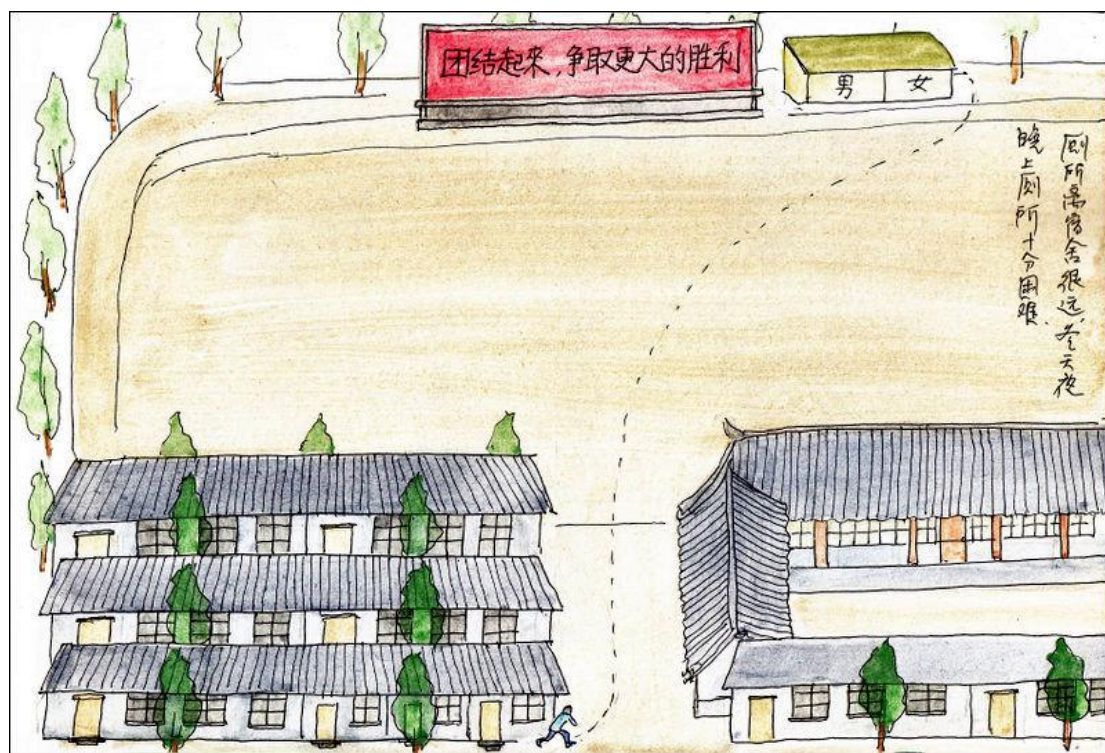
晚上躺在床上听着风声，总有一种世界末日的凄惶感觉。风声如天雷滚滚，由远而近，掠过树梢、电线杆和电线时发出尖厉的叫声，又由近及远，呜呜咽咽地没入苍穹。这种忽高忽低，忽远忽近的啸声如从天而泻的洪水，把人淹没在恐怖之中。

春天一样糟糕，北京以春天的风沙闻名，风力强度不亚于冬天，只不过少了一些寒冷。最糟糕的是泥土翻浆，整条路像个随意丢弃的大棉被，高高低低绵绵软软，根本没法骑车，推都推不动。这还号称一级战备公路呢。

将近十年后，这条战备公路上终于有了公交车，一个小时一趟，晚了一分钟，就晚了一小时。



一般的棉裤根本挡不住冬天刺骨寒风，我赶紧给自己做一条棉裤，我从来没见过做过棉活，此时无师自通，絮了一层又一层棉花。棉裤做好，厚得自己就可以站立在地上。



第一天到校看到我将可能待一辈子的地方，非常失望。学校以一个“大庙”为基础，大庙叫“香腮庙”，是清朝某代皇上娘娘用自己的脂粉钱所修造并且上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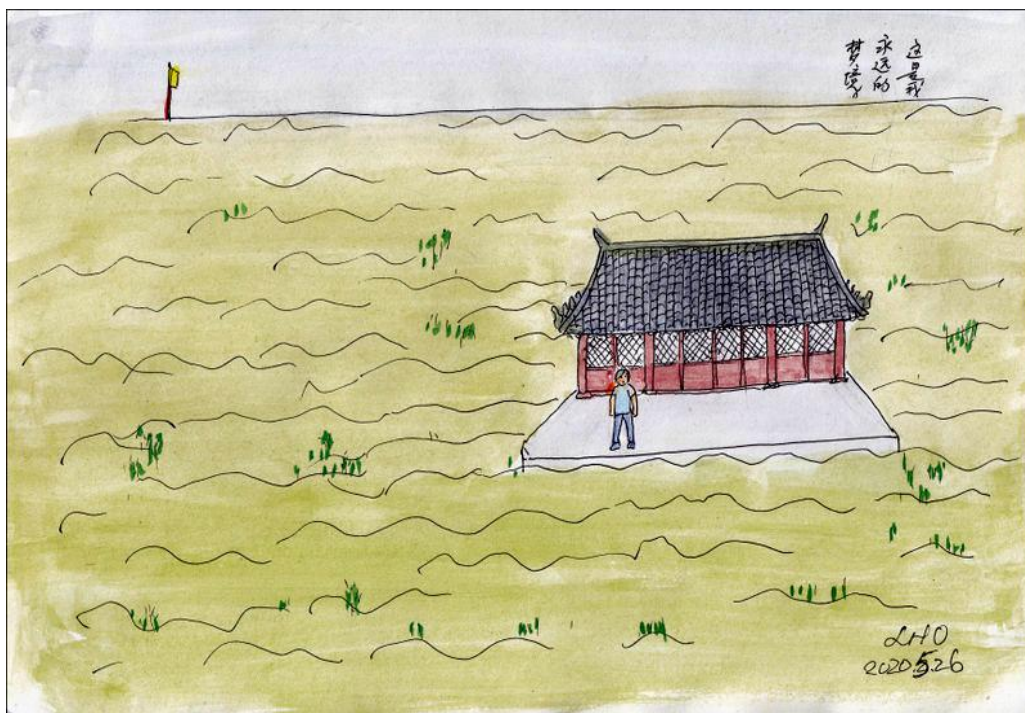


去处。大庙的前殿划分给小学校，和中学用墙隔绝开来。中学占了后殿及侧殿，已经年久失修，油漆剥落。大殿的后面有几排教室，也都是灰暗破旧的。

教师宿舍在校园的西南角，厕所却在操场的东北角，上趟厕所要“长途跋涉”。厕所三面有墙，无墙面向北，大敞，想一想刮西北风蹲坑的感受吧。



学校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台压水机，压出来的水颜色发黄，有臭滋泥味。学校的环境固然艰苦，不过我认了，想想我的在新疆兵团姐姐，在山西和内蒙插队的妹妹，以及班上那些被发配到新疆东北内蒙的同学，我简直是一个幸运儿。



后来的一生中，我无数次地梦见永丰，或是梦见房子怪异，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断了，退路也没有了；或是发大水，整个永丰地区变成一片泽国，尝试着摸索原来的道路回家，却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赶不上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最糟的事情是好不容易坐上了车，开了一大圈，发现又转回原地。总之梦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丰期间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绝望，绝望，绝望。

如今永丰中学早已搬离，与清华附中挂靠，成为知名中学。香烟庙已经重修，描梁画栋，列为国家保护文物，成为一个游览地。



学校还在搞运动，文革中层出不穷的运动对于一般群众来说就是无尽无休的政治学习。每天早上六点到七点半天天读，晚上七点到九点政治学习。如果刮风下雨学生不来上课就整天学；如果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总是首先通过晚八点新闻联播发表），就连夜庆祝游行并学习；若有重要中央文件下达就停课办学习班学习；寒暑假老师不要奢望放假，总是有全公社教师学习班，好不容易给一个星期的假，又被叫回去学文件或支援农业。

集体政治学习的本身就是浪费生命，多数时间是念报纸（给老师念报纸！），一个人念，其他人个个心怀叵测，老道入定般枯坐。念上个把钟头，时间就打发完了。最怕的是学什么最高指示或红头文件，人人都要表态，每人说一通赞美及表决心的话。我不会当众说话，也不会说违心的套话，所以总是等到最后一个才



发言，多数情况下，还没轮到我发言学习就结束了，我松了一口气，又忧心没发言被人看成落后分子。



每天老师们要向毛主席“早请示”和“晚汇报”，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是文革中从解放军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一套每天早晚对毛主席的膜拜仪式。每天早上全体人员要集中在一起，面对毛主席像，手捧“红宝书”，念几段毛主席语录。通常大家都选择最短的语录念，念多了，固定成为“老三段”：“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遍，“要斗私批修”三遍。然后挥动“红宝书”，高颂“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是为“早请示”。晚上政治学习后要进行同样一套念语录的程式，为“晚汇报”。此外，每顿饭前也要“请示”。食堂门口上高悬毛主席像，每个进食堂买饭的老师都要自觉站在门口对伟人像“请示”，也是那几句话。人们都觉得一个人站在食堂门前又念叨，又挥手，像发神经病一样，很是尴尬，所以通常是三四个老师赶在一起祝祷。



学校由“三结合”的班子领导和管理——一支左解放军、贫下中农宣传队和革命群众。老师绝大多数出身不好（文革前出身特别不好的学生只能上“师范专科学校”，但是这些人往往都是学校的业务尖子），在文革中分为左中右三类。一到学校，我就被大家密切注意会站在哪一边。

我被安排和小李老师住在一个宿舍。小李的面部很端正，鸭蛋脸，丹凤眼，稍有点龅牙。她最显著特点是两条齐腰长的大辫子，每天早上她都要细心梳理那两条辫子。这在文革时期是绝无仅有的，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拿着剪刀在街上见辫子就剪。小李因为有极好的出身的保护，才躲过了这一劫。

小李和我同年，虽然也是高中毕业，但文化程度不高，胸无点墨又不求进取，书教得一塌糊涂，也管不了学生，老教师们从心里瞧不起她，认为她教小学生都不够资格。其实她人不错，心地善良，不闹是非，只是入错了行而已。

小李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无疑是革命左派阵营的。她嫁了一个空军飞行员，飞行员在人们心中的排行榜上要比一般陆海战军人高级得多，小李更是身价翻倍，理所当然地成了革委会提拔的对象。无奈她没有野心，不张扬，不爱学习，不爱开会，对政治毫无兴趣，唯一的话题就是丈夫和孩子。

她的丈夫每次飞行任务完毕回到北京，不管多晚回来，都要叫她回家睡觉，有时打电话召唤，有时亲自坐着120吉普车来接。丈夫有几天假期，她一定请几天假和丈夫共享夫妻之乐。那一阵老师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到九点钟，早上六点半

天天读，不允许请假回家，唯独这个空军飞行员的妻子畅行无阻，老师们议论纷纷，对她享有的回家特权十分不满。小李根本不在乎别人有什么怨言，照样像一个贤惠的妻子对丈夫尽责。生了小孩以后，小孩更是她的头等大事。革委会也看出她是麻线穿豆腐提不起来，就随她去了。后来她自己感到教中学实在力不从心，离家又远，要求调到山前，教小学就行。飞行员的老婆总是好办，军队一发话，地方马上办理。小李在众人的艳羡之下，顺顺当当到了“山前”。

学校里还有一两个异常积极的左派，十分招人痛恨，以至五十多年后同事们聚会没有人邀请他们，甚至连一次也没提过他们的名字。他们表现与文学作品或电影里那些“左”派大同小异，此处就不再浪费笔墨。



1968年5月，毛泽东批示了新华印刷厂对敌斗争经验报告，“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国展开。永丰也开始抓阶级敌人的斗争。四十几个教职员的小单位，敌人在哪里？一天下午革委会召集全体老师开会，革委会张副主任到台前，义正词严地宣布：“把反革命坏分子隋某某揪出来。”

隋某某，音乐老师，二十五六岁，深沉文雅，带个金丝眼镜，样子不俗，一看就是搞艺术的。因为出身不好，音乐学院毕业后贬到这个地方来，教学生唱歌。

一个女老师走上台，涕泪交流地说：“我要控诉隋某某破坏军婚的罪行！”女老师的丈夫是军人，在外地服役。她说，她和隋在北京都没有家，周末常常在一起聊天，隋处处对她表示关心并常常向她诉说内心的孤独，“骗取”了她的同情，



于是他们就发生了罪恶的关系。

老师们愤愤不平，这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事，特别是女老师已经结婚有孩子，而隋某某还是一个“生瓜蛋子”。女老师是主动“坦白揭发”的，没事。隋老师被搞得很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劳改，不允许教课。

隋老师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很难说这里没有派性报复的因素，永丰的“清队”就这么简单，茶杯里起风波。

一次我经过隋老师的宿舍门口，里面传出来华丽丽的手风琴曲，是欢快的阿尔巴尼亚歌曲《地拉那之歌》。我对外国歌曲最没抵抗力，禁不住歌声即将飞出胸膛的诱惑，推门进去，随着风琴放声高唱：“在十一月美丽的日子里，地拉那充满欢笑，烈士们献出生命，为你自由繁荣……”那阵除了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外国歌都不能唱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好朋友，唱这个歌不会犯错误。这以后我一听到隋老师的手风琴声，就不由自主地跑到他的宿舍放歌，完全忘记了眼前是个“敌我矛盾人民内部处理”。

不知什么时候老隋结婚了，无声无息地和附近村庄一个农村妇女。他一下课就回家，去面对挣工分，分口粮，种自留地和申请困难补助的问题，再也听不到他的手风琴了。前些年回国和老师聚会，问起老隋，说早就去世了。什么病，没人说得清。算一算，才是中年，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世上消失了。



与我同时分配来的有一个男老师小李，也是因为出身不好没考上大学，曾在十一学校代培。他大高个，一米八五以上，长胳膊长腿。我和他很说得来，我们从城市来，刚刚经历了文革的各种盛大场面。这个小单位的文革似乎不过是本单位之内的派性斗争，让我们觉得很可笑。

到永丰第一年的暑期，小李去青岛老家（放假的第一天又把老师们召回学习最新指示，幸好小李已经坐火车离京），回来时带来一个大酒瓶装满了液体，不告诉我是什么东西，一定要我尝一尝。我对着瓶口喝了一口，又苦又腥，原来是海水，小李高兴得拍手大笑。我对他突然有了一点点心动的感觉了，心想没准可以发展和他的关系。☞

## 【人物】

# 另类“红二代”

## ——知天命者李飞飞

石名岗

酒肉朋友群人才济济，多为不甘人下、不落人后的强者。而在酒肉朋友群中李飞飞则是极少数人人皆赞的“知天命者”。这不仅是因为李飞飞写了一本《知天命》的书，也是由于其异于常人的思想方法和见解。

### 一、一个很正的人

李飞飞一个多年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飞飞是一个很正的人。正者，正直、正派、不要阴谋诡计也。李飞飞的这个性格似乎遗传于父亲，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飞飞之父年轻时接受进步思想，1924年闹学潮反对县长贿选，被通缉流亡口外，挺不安分。三十年代逐渐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抗战前期已是山西新军二〇九旅（政卫旅）代旅长兼参谋长。当年的旅级在1955年授衔时大多为上将或中将军，相当于行政五级或六级。飞飞之父参加革命近五十年，定级行政十一级已很低，但也算正厅级。由于常有“异见”，官职却老在厅级和处级之间徘徊，非常之不得意。

李飞飞之所以成为“另类”，是因为其“逆反”性格和“逆向”思维。

李飞飞常自嘲像魏延一样脑后长有“反骨”，常常“出力不讨好”“逆反”性

格和“逆向”思维相辅相成，成就了一个活脱脱的另类“红二代”。

像李飞飞这样的“红二代”，在青少年时期大多都优先入队入团，担任学生干部，而李飞飞由于思想异端，常与落后同学混，不受老师和领导待见。初中时，一位与李飞飞要好的同学疑似写了“反动标语”，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而逮捕，以至于李飞飞也受到影响。1964年，李飞飞中考时成绩相当不错，但因为政审不合格被高中学校三次退档，理由是与反革命分子划不清界限。幸好其父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任副秘书长，找了分管文教的市领导，他才得以升学高中。

1969年，李飞飞参军到空军高炮部队，驻扎在福建省山区。由于给连领导提了几条意见，李飞飞被发配到连队的炊事班任班长。其实李飞飞挺要求进步的，不但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而且工作特别卖力。连队的阵地和营房在山包上，吃水需要炊事班到山下挑。李飞飞同时入伍的战友赵敏是这样描写挑水情况的：“一条泥泞的山路逶迤通往山下，走出近1公里，只见三个人正挑着水往上走，不，是往上爬，后面的那个光头大汉，正是李飞飞，挑着一副比别人大一倍的大木桶，扁担换成了竹杠，正低着头，一步一步地艰难挪移前行。不知是汗水还是雨水，湿漉漉的军装上，肩头打着补丁，泥巴沾满胶鞋和裤腿，寒风中头上和嘴里都冒着热气，我似乎听到那呼呼的心跳和急促的呼吸。我不忍再目睹这一切，眼里和心里都酸了，扭头向山上跑去。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生在大城市从小读书的高中学生，一个长在优越家庭环境下的高干子弟，千里从军竟然是这样的遭遇。可就这样，还被人说成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真不知这样的日子，他是怎么过来的，还要过多久。”李飞飞挑的两大桶水少说也有二百斤，但也评不上“五好战士”和“学毛著积极分子”，后在赵敏（空八军学毛著积极分子，团四好总评工作组成员）的坚持下，才勉强评上“五好战士”。与赵敏相比，李飞飞就是一个只干不说（或不会说好听话）的“笨把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李飞飞已任太原卷烟厂厂长多年。期间，力争进口了生产过滤嘴香烟的国外先进生产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使太原卷烟厂的卷烟质量、规模、效益，有了较大的提高。

1991年3月间，省长王森浩带队到太原卷烟厂考查，座谈会在厂小会议室召开。在会上，李飞飞发表了三个惊人的观点，一是企业管理是厂长的事，不是省长的事；二是一个企业搞不好是厂长的责任，大多数企业搞不好是省长的责任；

三是时下实行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全国同类企业的竞争实际上已演化为各省政府之间的竞争。就这样李飞飞公然向省长发起了挑战。王森浩在回去的车上说，这样的企业家再优秀也不能用，后被免职。后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省委组织部曾拟安排李飞飞到某机械系统大型国企任职，遭李飞飞拒绝。再后来，李飞飞任朔州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在处级位置上退休。

李飞飞为官二十多年，按说应该深谙为官之道，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可谓“愚”也。

## 二、逆反心理与批评家

想来作一个批评家，逆反心理是必要条件，因为批评家都不太得志。当别人称赞李飞飞是思想家时，他自谦自己是批评家，可见批评家的境界要低于思想家。其实批评需要一定的思想基础作为批评的依据，不过没有思想家那样深刻、系统及完整而已。批评家看世界多看到的是不合理不完整的方面，或从一个视角来观察世界，故有时不失于偏颇。如现代大批评家鲁迅，无论是杂文，还是小说，对旧中国都批评的入木三分，但从未见到他自己的完整思想体系，而且有时观点相当偏颇。

李飞飞的“逆反心理”可以从他的书和语言中体现出来。

如对“酒”的看法。一般地讲，饮酒多能乱性是公认的，酒能使一些人作出“英雄行为”是个例（武松打虎），李飞飞却能把酒提到对打江山有利的高度，其诗云：“人说酒乱性，我说酒任性。若无酒助兴，皇帝永一姓”。

又如对“妓女”的看法。妓女从古到今都被主流社会所歧视，李飞飞举了梁红玉、小凤仙、赛金花、杜十娘等为妓女“平反”，认为出卖肉体的妓女比出卖灵魂的官员强得多，并得出一种理论：在贫富不均的社会，这种行为不失为一种财产转移的通道，使弱势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在这种转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积累，从社会学角度看也不是坏事。

再如对“赌博”的看法。他把赌博和公平竞争并列，认为统治者打江山是一种赌，不能自己赌而不让百姓赌，其诗又云：“逆取江山实为赌，博弈赛场亦自得。公平竞争寻常事，百姓点灯又如何”。……

“逆反”是一种心理，批评则是一种行为，李飞飞就这样从“逆反心理”上

升到了批评。

李飞飞博览群书，对先秦文学和政治哲学尤其熟悉，老、孔子语录及毛主席语录脱口而出。这是他批评的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李飞飞有三大批评，即对省领导的批评、对“黑白猫论”的批评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山西省领导思想保守，相对其他省而言山西省的改革步伐严重滞后，致使山西的经济成为“二战区”（此为戏称，源于抗战时期山西划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皆因一度传说名列全国倒数第二（西藏为倒数第一）。在这种情势下，李飞飞对省领导提出尖锐的批评。李飞飞认为，和过去比进步是不科学的，比过去就要与阎锡山比，阎锡山在山西当政时综合指数全国第二，是民国时的模范省。改革开放以来，山西从解放初的前五名落到现在的二十名以后，说明我们干了四十年不如阎锡山。山西完全有条件出台一些更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政策，而不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毫无新意的“35条”等等。

阎统治山西近三十多年，除却抗战八年，内战三年，真正治理山西也就二十年左右。阎曾提出发展山西的十年计划，推行义务教育，实行村政自治，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奠定了山西的交通、钢铁、机械制造、纺织、电力等工业基础，把山西变成了全国第二的“模范省”。其中西北制造厂是全国三大兵工厂之一，抗战时期晋绥军的武器大多是西北制造厂（时迁至四川广元）制造的。

李飞飞的这一批评当然是正确的，山西省领导的不作为必须批评，但与阎锡山时期相比却有失偏颇。阎锡山与那时的省领导相比不是一个层次的人物，像阎锡山这样的人物在他的时代，在全国也就四五个，而山西省领导式的人物在现代中国是一抓一大把。阎锡山是领袖级的人物，有一定思想，又有实践能力。他发展山西的方法有点像社会主义，或者像当年“洋务运动”的措施。他在辛亥革命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再者，当时各省属于“自治”性质，给了他充分的发挥空间。现在的山西领导都是没有独立思想的官僚，而且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束缚下，有能力也难以发挥。所以是无法比较的。

李飞飞第二大批评是针对“黑白猫论”的。他对“猫论”的批评有两点。

一是造成人的实用主义思维，金钱至上，不择手段，导致假政绩、假文凭、假酒、假药、假商品泛滥。二是泯灭了信仰，道德沦丧，丧失诚信，李飞飞用孔子的话批道：“国丧百年，德丧万世”。李飞飞认为：“‘猫论’的诞生为造假提供



了利器，它给改革带来的虚幻繁荣的海市蜃楼后面将是通往地狱之路，在诚信正与社会格格不相融的时代，国家、民族出路何在？”

其实，李飞飞没有说明“猫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并过分夸大了“猫论”的作用，这就是批评家的局限性。

所谓“猫论”就是一句四川常用俚语，也许是由于是顶级大人物说的，就被好事的人们夸张为“猫论”。在改革开放遇到阻力的情况下，为阐述“不管姓社姓资，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思想而顺口说出的，在历史上起到过批驳极左思潮、促进改革展开的作用。即便如此，采取的资本主义的政策，如土地承包、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等，还是被冠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牌，盖因为上上下下都对资本主义“恨之入骨”。

客观地讲，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造假”“丧德”等现象，是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变时期必然出现的问题，即资本原始积累阶段不可避免的问题，不是“猫论”所决定的。孔子理论比猫论要系统，影响大多了，他讲德至今两千多年了，国人依然“丧德”者众，可见人是依靠实际而活，不是依靠理论而活，“猫论”影响有限。从历史上讲，在没有类似“猫论”的条件下，欧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靠“圈地”、贩卖黑奴、掠夺殖民地等手段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尾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与新生儿一样）。同理，没有“猫论”，照样会出现资本初期那些非常手段，老老实实劳动哪能在短期内致富？

李飞飞第三大批评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评。

市场经济显然是私有制的产物，也就是商品归个人或某个法人所有，用来与别人交换，所以私有制是市场的基础。社会主义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产品属于全社会所有，总不能自己与自己交换，因之，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为此，李飞飞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提出了质疑。在理论上李飞飞无疑是正确的。

一般地说，实际与理论总是存在的差距，但社会主义概念的差距却特别巨大。我们总是站在旧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分析问题，这势必会得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悖的结论，因为斯大林主义本身就是否定市场经济的。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何其多也，有西欧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有俄国列宁的社会主义，有亚洲印度的社会主义，有伊斯兰社会主义，有民族社会主义，甚至有希特勒的社会主义……

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就数十个之多，加上名为资本主义、实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就更多了，可见社会主义有多吃香！但是除落后的非洲以外，公开奉行斯大林社会主义的国家只有包括朝鲜在内的一两个，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按马克思社会形态自然发展的规律，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遭到了淘汰。其实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斯大林主义都不是社会主义。人类构想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及吃饱穿暖的生活，而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却一项也没有体现。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无论是自由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应该是人类发展中的手段。如果把手段当作目的刻意追求的话，那就是本末倒置，或者是别有用心了。遗憾的是近现代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这种现象。

现代“公有制”是一个伪命题。原始部落的公有制由于部落规模、人数、生产工具都很少，成群结队集体渔猎采集，实行平均分配，使公有制得以存在。现代国家式的公有制，理论上财产属于全民所有，全体公民应该都有分红的权利，但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实行了公有制企业利润的“全民分红”（似乎只有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进行改革时，将国有企业股券分给了全民）。近几十年来，原“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民企总产值超过国企。另外国企或被职业经理人承包，或被官员垄断（拿着极高薪水），或搞成股份制，其利润已归个人或集团所有，原概念的公有制也不复存在。由于“社会主义”概念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也有了一定依据。

在李飞飞身上，批评家的尖锐和偏颇同在。

### 三、逆向思维与思想家

从逆反心理到逆向思维，从批评家到思想家，不知别人是否经历了这个过程，李飞飞似乎是经历了这个过程。大凡批评家总是从一个侧面叙述问题（即攻其一点），而思想家则是从多面叙述问题。相对于批评家的片面性，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兼容性，思想家比之批评家是一种思想升华。

据笔者了解，李飞飞至少在三个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即剩余价值问题、文革问题及革命问题。

笔者被剩余价值问题困扰多年，总觉得不是很科学，但不知错在哪里。有一次我问李飞飞：“你对剩余价值怎么看？”他考虑了一下说：“剩余价值是在市场

上实现的。”一句简单的话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了修正。

马克思经典理论认为，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实现的。马克思《资本论》把原价值论的资本构成即固定资本、流动资本，改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意思是要表明商品价值的增长（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工人工资）产生的，就是说资本家的利润全部是工人创造的，没资本家什么事，这是资本家剥削的本质。这个学说实际上存在巨大的缺陷。

缺陷一，如果说“劳动和自然界是财富的源泉”（《哥达纲领批判》语），那么，工人的劳动是现在的劳动，而资本家的资本就是过去的劳动。只承认现在的劳动，不承认过去的劳动，至少在理论上是说不过去的。

缺陷二，关于“劳动”概念问题。在老的经典的概念里，只有制造业的直接劳动才创造价值，运输业、服务业等非无形产品行业不创造价值，甚至制造业的其他人也不创造价值，他们只是分享直接劳动创造的价值利润。一个企业，尤其是现代企业，其产品过程是由设计、原材料进厂、制造、质检、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组成。“产品”的概念也有了扩展，从有实体的有形产品到无实体的无形产品，实在不是马克思时代所能想象的。其实，现在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的素质和专业要求比较高，他们在企业中的地位比一般工人要高，薪酬也高。资本家对企业的管理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工程，一种高级的劳动，当然不能说资本家是“不劳而获”。

缺陷三，学说中的自相矛盾。在政治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但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劳动力起作用，其它两个因素，由于不创造价值，在价值规律支配的社会里，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在可见的未来，如果工厂里都是智能机器人在操作的话，它们的产品是否没有了价值的增值。

综上所述，把“剩余价值”定义为商品价值的增值是不科学的。剩余价值正确的定义是资本家在市场交易中以低于劳动力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力时，价值与价格的差价，即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价值与价格之差。劳动力作为商品，也有成本和利润。成本就是劳动者基本的生活费用、自身的教育费用和固定资产（房、车等）的折旧，利润用于劳动者的“扩大再生产”（繁衍后代）、娱乐及积累等。

理论上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这种市场交易是公平的，剩余价值不是一种剥削。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的初中期，由于劳动力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供大于求，再加上资本家乘机压低劳动力价格，这样除个别特殊技术工种外，市场的劳动力价格远低于其价值，形成实际上的“剥削”。在现代，落后国家的资本家的“剥削”远胜于先进国家，这是因为欧美先进国家其劳动力价格已属于正常波动范围，相比之下他们的工人工资显得很高（尤其是手工劳动者），这也是这些国家中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原因。李飞飞把剩余价值归于市场应该是经济学上的一个突破。

在文革问题上，李飞飞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近十几年，对文革的回忆、反思、研究成为热点。在人们不停地纠缠在肯定否定的争论中之时，李飞飞开辟了客观对待文革，重视探讨文革在历史中的地位的新思路。

分析文革的起因，李飞是这样说的：“在人们还未对发生的一切进行全面反思时，执政者便以‘十年浩劫’一言以蔽之盖棺论定了。斗争如此波澜壮阔，过程如此血腥惨烈，长达十年之久，岂能用偶然错误来掩饰？岂是一人发动起来的？”简言之，文革的发生不是某个人任性的结果，而是各种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这一点很像历史唯物论的客观论的表述。很显然，这种表述比把文革归功于某人，或归罪于某人，要全面得多。

需要声明的是，李飞飞本人是坚决反对文革路线和文革作法的。

李飞飞对文革中的反人类的疯狂、消灭文化的恶行进行了激烈抨击，比喻为黄巢军进长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遍公卿骨”。同样，李飞飞也看到了文革的另一面。他说：“仅仅十年的文革就给中国人带来了自我意识，这真是里程碑式的变革。与任何一次中国所谓流血革命相比，这个收获是最大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解放直接结果是独立思考和权威的打破，前者体现在文革后期大量“反革命”集团的出现，后者体现在“四五”运动。

李飞飞说文革是最和平的暴力革命，又是最暴力的和平革命。在革命史上，文革与法国、俄国革命相比，它是最和平的；与南非、印度革命相比，它是最暴力的。文革的研究者们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给予合适的历史地位，并且找出比文革代价更小的社会变革道路。

在革命问题上，李飞飞打破了习惯思维，认为革命对社会资源消耗很大，而

不一定总是能带来进步的好的结果。

这个问题与上个问题有着有机关联。文革是改革的催化剂，回头看，这就使得人们被迫作出选择：或经过十年痛苦快速进入改革，或经历也许五十年以上的缓慢历程再改革。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革命得失的原因。

革命，指暴力革命，往往要经历痛苦的过程，并且要丧失巨大的社会财富。以人们标榜的法国大革命为例，杀国王、杀贵族、杀同盟者、杀自己人，孕育出帝能代了一个雅各宾专政的怪胎。数年的内战分裂了民族，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间接结果是造就了一位皇帝，征战十年左右，被激进的史学美名为“输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资产阶级革命可以输出？独裁的皇帝能代表资产阶级？）。最后被流放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朝复辟。可以说，法国大革命既没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又没有奠定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基础。之后的近六十年间，法国又经历了一次革命、拿破仑第三的过程，才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真正奠定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

从另一方面看，革命是社会矛盾积累的结果。对于上层来说，负有管理责任；对于下层似乎造反也是“逼上梁山”的。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革命”理论，后来发展成“阶级”理论，成为社会分裂的源泉。

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旗帜的革命，竟然得出这样的结果，值得人深思。革命是以社会分裂为基础的，而一个相对好的社会和制度必然是以社会合作为基础的，所以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民主是个好东西，革命不是好办法。

由此，李飞飞迈入了思想家初步的门槛。说是初步的，是因为李飞飞的思想火花往往没有展开。希望李飞飞加紧努力呀！

下面说说飞飞的《知天命》。

大凡人读书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读书信书，二是读书不信书，三是读书又信又不信。也许第三阶段就是所谓“知天命”的阶段。

孔夫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可不是人人如此，一般人估计到一百岁也不一定知天命，最多是社会经验多一些而已。2010年，李飞飞出了一本书，题目“知天命”。为该书作序的杜导正先生自言“七老八十才初知天命”，李飞飞出书时六十二岁，知天命也算是够早的。可以说，《知天命》是李飞飞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知天命》由当时九十二岁的李锐题写书名，由原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著名理论家张显扬作序。张显扬认为“这年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实属难能可贵。”并说：“但愿飞飞这本书，能够给这个昏聩的世界一个小小的惊喜。”

《知天命》全书有文章一百二十余篇，分七个板块：门外杂谈、戏评时弊、旧事新说，灯下偶得、也算是诗、短语拾零及师友沙龙。“文体多为随笔、散文、政论、诗和读史札记，也有一些地道的理论文章。师友沙龙那部分是友人谈论其人其书的。飞飞交往甚广，读书很多，记忆超群，成语典故，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读者未必都赞同他的观点，但我敢担保，所有文章都是愤世嫉俗之作，没有一篇是献媚之作，因而可以嚼出一些味道来。”张显扬这个评论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从每个板块随机选一篇文章加以介绍，希望能反映《知天命》的全貌。

在“门外杂谈”中的《耻谈晋商》，在山西人一片过分赞美声中对晋商提出了批评。现代山西商人自诩为晋商后裔，传承了晋商“诚信”精神。在省政府搬迁后，这批商人居然又能力把山西省政府原址（原清代巡抚衙门，阎锡山督军府）改为“晋商博物馆”，相当于把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歪曲成了晋商史。李飞飞在文中从两点揭露了晋商的真面目。一点是晋商出身官商，即开始时晋商是大多为受官家委托从事供给戍边军队物资的商人，后来发展到边贸；另一点是在长期的边贸中，与满蒙等贵族交接，为满蒙提供“情报”和战略物资，成为外族入侵的“领路人”即“汉奸”。李飞飞的分析，第一点是对的，第二点需要“证据”。不过，把晋商捧为“现代市场经济之祖”是无知的表现，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大工业为基础的，岂是一群封建商人可以比拟的？另外把“诚信”标榜为晋商之标记也是无知的，天下商人同一性，晋商岂能独善其身？

“戏评时弊”有篇《流通领域改革之反思》。李飞飞认为，把“多渠道，少环节”作为新的改革纲领是不正确的，将造成严重后果：其一，多渠道给不法商人制假、售假提供了便利；其二，在“寻租行为”驱使下，官员易造假、贩假者的帮凶；其三，由于渠道的混乱，造成国有中小企业竞争力不强（销售手段的限制、成本过高），濒临破产，大量职工下岗。解决的办法是建立一个供求双方衔接流畅、运转润滑、公平、诚信为基础的有良好秩序的市场平台。

“旧事新说”中有文《张学良并不伟大》，说张学良一枪不放放弃东北，使之沦陷为日本的殖民地，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牺牲民族大义保存实力。又说在

西安事变中执行第三国际指令，讨好蒋介石出卖盟友（杨虎城）。这也许是《知天命》中最不成功的一篇文章，像张学良这样的吃喝嫖赌抽、“欺软怕硬”（怕日本，欺蒋，自己不抗日让别人抗日，替自己收回地盘）、性格多变的公子哥，没人说他伟大，最多是夸大了西安事变的作用。文章未抓住张学良的要点。不过，作者也许没有意识到，文章隐含了另一个意思：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在第三国际的调停下，在严峻的抗日形势的逼迫下，国共也会达成共同抗战的协议。这就是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客观必然性。

“灯下偶得”是读书札记，其中《读〈比干不通〉》挺有看头。《比干不通》是林鹏先生《蒙斋读史记》中的一篇文章。这里涉及一段商臣比干被纣王剖心杀害的故事。《吕氏春秋 过理》篇曰：“杀比干而观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诸家对孔子所说的“其”字有所争论，多数认为“其”指纣王，林鹏认为指比干。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暴君是应该“愚忠”，还是“良臣择君而仕”？李飞飞认为林鹏是对的。比干助纣为虐，剖心被杀，不值得同情。进一步李飞飞认为，臣子“让昏王下台不仅是权利，而且有义务”，“愚忠”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将导致祸国殃民。我们应该为李飞飞的观点点一个赞。

“也算是诗”确实也算是诗。飞飞作诗从来表达思想为主，不太拘泥平仄，形式上像格律诗，本质上是古风，就如他的性格吧。该板块大部分是批评诗，用诗来批评也是飞飞的一大发明。有一篇组诗《戏说诸子百家（十六首）》对庄周、孔丘、墨翟、老聃、管仲、孟轲、韩非、商鞅、曾参、孙武、苏秦、张仪、信陵君、范雎、惠施、公孙龙、盗跖等十七位作了评价，可见作者对先秦人物相当熟悉。作者对其中的十五位基本肯定，作了正面或中性评价，则对韩非、商鞅二人进行了谴责，录这二首如下。

#### 七、韩非

本是帝王附骨疽，  
千年之后有人吹。  
谀王过头同门陷，  
吹者下场蝼蚁推。

#### 八、商鞅

城门变法似得意，  
未想试法是自己。  
秦如虎狼祸天下，  
中华百代受此累。

“短语拾零”类似于语录或警句。


自励警句：越磨越圆的是石头，剑是越磨越利、越薄。我愿做脆利的剑，要么刺穿，要么脆断，绝不做人踢滚的石头。（笔者点评：像十八岁时的座右铭！）

讽刺警句：世界上最难做莫过伪君子，总是费尽心机藏头藏尾且善变，但最好收拾，只要照其面直戳，即穿。（笔者点评：子非鱼也。）

异见语录：习惯把男女苟且，社会混混一类称作流氓，我看至少是不准确。我给流氓的定义是：故意不按共同制定的游戏规则出牌的就是流氓行为，屡屡故意就是流氓，而这样的团伙就是流氓集团。（笔者点评：准确！）

逆见语录：历史可以把残暴变成功绩。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虐犹就不会有现在的以色列国，照此推论以色列应该给希特勒立国父之碑。长城、阿房宫的伟大下面同样也掩盖着秦始皇残杀百万国民的罪证。因此，杀人恶魔和政治家都喜欢用未来说事，因为未来可以掩饰所犯下的一切先行罪恶。（笔者点评：不要把政治家一棍子全打死。）

短语、警句显示了作者批评家和思想家的英雄本色。

我们用最后一个板块“师友沙龙”中曹思源先生《民间思想家不可挡》的一句话结束本文：李飞飞《知天命》中“每一篇文字都不多，但读者得到的启示却不少。”祝愿《知天命》的读者早知天命！

## 【人物】

### 蒯大富魔窟中的贾春旺<sup>1</sup>

陈楚三

我的同班同学邢竞侯曾在蒯大富的魔窟中被残酷折磨 146 天，清华百年校庆后他打电话慰问因病未回校参加班上校庆活动的郑则经（郑在文革中是团派《井冈山》报工作人员），郑则经在电话里主动提到文革中邢被绑架之事，告诉邢竞侯：“我在山上（按：指 200 号）看到你了，我也看到他们是怎么打贾春旺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啊！我没有看到他们是怎么打你的，但我知道，你的遭遇也好不

<sup>1</sup> 贾春旺，1938 年 5 月生，北京市人。1958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62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中被蒯大富绑架关押，遭受酷刑迫害。文革后，贾春旺先后担任清华大学校党委常委、北京市委常委兼海淀区委书记、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中共 12 届、13 届、14 届、15 届、16 届中央委员。



到哪儿去。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当时我没能帮你点什么,心里一直挺过意不去的。”

薛明德老师告诉我,“早年我听说老蒯抓贾春旺的主要目的是因为贾春旺曾与沈如槐一起去武汉串联,想从贾春旺处榨出沈如槐的材料。我知道贾春旺在里面被打得非常惨,但是我不敢当面问他过去的事情,怕勾起他恐怖的记忆”。

贾春旺在文革前是清华教师、兼职校团委干部,文革中支持414派,于1968年3月27日被蒯大富指令绑架,在蒯大富的黑牢中被毒刑折磨130天之久。薛明德知道贾春旺“被打得非常惨”,郑则经亲眼“看到他们是怎么打贾春旺的,那真是惨不忍睹啊!”我和贾春旺过去接触不多,不知道他在蒯大富黑牢中的遭遇;直到2019年3月,才有机会与贾春旺见面,了解到蒯大富打手们刑讯贾春旺的大略情节。

贾春旺被绑架后,起初关在一间窗户蒙着厚布的房间,在外面听不见里面打人的声音。贾春旺回忆说,团派的打手们非常凶残,不知道这些学生怎么对自己的老师下得去手。打手们曾经用一张铁丝编的苍蝇拍子抽贾春旺的脸,打得他满脸是血,铁丝拍子都打散了。

抓贾春旺的时候天气还凉,贾穿着一条秋裤,打手们常常把贾按在地上打大腿和臀部,臀部打烂了,血水把秋裤和大腿、臀部粘在一起,一动就疼得发抖。

中整办调报字【83】3号文的附件,列出蒯大富的打手肖元星是怎样迫害贾春旺的:他曾对贾春旺“用皮带、皮管、木棒打屁股和腿。当贾全身是伤时,还逼贾做下蹲动作和仰卧起坐”“还打过罗征启、黄安妮等”。肖元星是“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的主要成员,动农系零字班毕业生,离校后在兵器系统某研究所工作,文革后“清查”时被列为“记录在案”对象,有关部门曾找过贾春旺了解肖元星的罪行,贾春旺也如罗征启一样,以德报怨,没有追究。另一个打手叫宋恩宽,是土建系零字班毕业生,他“用方木打李康、贾春旺的腰,头撞墙,烟火烧脸”,宋恩宽文革后“清查”时也被列为“记录在案”对象。

开始一段时间不准贾春旺离开屋子一步,两个团派看守手拿长矛把着门,地上放一个便盆,大小便都得在屋子里;后来天气越来越热,看守都忍受不了屋子里大小便的难闻气味,才让贾去厕所解手。

去厕所时用黑布蒙着贾的双眼,看不见怎么辨别方向?打手们懒得动嘴,却

想出一个“妙法”，他们用铁丝做成两个钩子拴上绳，押送的人一边一个拿钩子勾住贾的两个嘴角，手上拽着绳，像牲口嚼子一样，要往右拐、右边的押送人就拉右边的钩子，往左拐、左边的押送人就拉左边的钩子。谁能想到，堂堂清华高等学府的学生，竟然如此下作，竟然使用这样侮辱人格的损招！

虽然蒙着眼睛，其实还是能模模糊糊看到东西和专案组的人，贾春旺认出，专案组中有一个是他教过的学生，另一个是原校团委干部。这个团委干部文革后曾担任过北京市某区的区委书记和北京市政协领导职务，贾春旺考虑此人总算是为国家做事，所以没有揭发他。

贾春旺被转押到200号以后，专案组还曾经对他搞过假“枪毙”。有一次，他们对贾说414准备包围、进攻200号，要是414打进来，就先把他杀掉。他们把贾春旺脸朝下按在地上，有人骑在他身上，手拿匕首顶着他的脖子，一面用力把刀尖往下压，一面威胁他：老四要攻进来，我们就先杀你，你现在赶紧交代罪行还能饶你一命。

团派打手的残酷刑讯手段堪比渣滓洞。

贾春旺说，最凶残、最没有人性的是冯家驷。

冯家驷是电机系零字班毕业生，团专案组的主要打手，“他采用各种刑具拔牙、灌氨水迫害干部”“拔牙”成了团专案组一众打人凶手中冯家驷独具的“特色”，冯家驷也因此获得“牙科大夫”的“雅号”。文学宓就是被他生生掰断了三颗牙。我的朋友、原团派总部委员孙耘曾告诉我，冯家驷的妻子是冯的中学同学，知道清华有揭发冯家驷拔牙的大字报后问冯是否确有其事，冯反问：你是相信大字报还是相信我？答曰：当然相信你。我认为，冯家驷和其妻的这段对话，表明冯家驷实际上否认“拔牙”的指控；孙耘可能更愿意相信冯家驷，说“给贾老师拔牙和掰掉文老师三颗牙等细节我是第一次听到”，并问我“拔牙的事是不是他（按：指贾春旺）亲自告诉你的？”看来，只有贾春旺“亲自”告诉了我，这位朋友才会相信冯家驷这位“牙科大夫”不是“妄得虚名”，拔牙确实是“真的”事实。

贾春旺说，冯家驷拿一把钢丝钳逼供。他用钢丝钳拨开贾春旺的嘴，敲着贾春旺的牙，威胁说“不承认就拔牙”，贾春旺不承认那些捏造的东西，冯家驷就用钢丝钳夹住他的门牙使劲拔，夹碎了两颗牙，但没有拔下来，牙根还在。这是

贾春旺“亲口”所说，我“亲耳”听到的，我的团派朋友们总该相信了吧！？

冯家骊对文学宓拔牙，掰断了三颗牙，对贾春旺拔牙，夹碎了两颗牙，都没能连根拔出；但这丝毫不能减轻冯家骊“拔牙”的残忍罪责，不是冯家骊不想连根拔，而是他“技术”不到家，毕竟，冯家骊不是专业的牙科大夫。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一个清华大学的一年级学生，竟然能对自己的老师下这样的狠手！罗征启曾说，冯家骊等人“残暴无人性”，冯家骊“非常残暴，他一般打你后，听到你痛苦的喊叫声，他会露出得意的‘狞笑！’他的行为让我读懂了‘狞笑’这个词。”罗征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诠释了冯家骊的残暴和无人性。

离开蒯大富的魔窟近一年后，贾春旺才到医院装了假牙。文革后“清查”时，冯家骊理所当然的也被列为“记录在案”对象。据我所知，冯家骊对他“拔牙”的文学宓、贾春旺以及受他酷刑迫害的其他老师、干部、学生，至今没有任何忏悔和愧疚，“好像这一切都不曾发生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像孙耘所说对冯家骊“多一分宽容和理解”呢？

他们对贾春旺除了毒刑拷打，还罚站，不许睡觉。

开始是让贾春旺双手举着凳子罚站。时间一长举不动了，只要凳子一歪，打手们就打；后来打手们怕贾春旺睡着了凳子掉下来砸着他们，也怕贾趁他们睡着用凳子砸他们，就改成让贾春旺举枕头。他们每天三班倒，贾春旺全天24小时都得站着，只有吃饭的短时间可以坐，看押他的人常常熬不住睡着了，长矛就靠在旁边，贾春旺完全可以拿起长矛捅他们，可是想到他们都是学生，贾春旺不忍心下手，再说即使捅了他们，自己也逃不出去，反而会遭到更凶残的报复。

罚站的时间一长，贾春旺的前脚掌就肿起来，然后是脚后跟肿起来，接着脚心也肿了，钻心地疼；再站，脚脖子肿，并且越来越往上发展。200号还有医生，医生说要是肿到膝盖，人就完了；贾春旺一直被罚站，小腿肿得跟大腿一样粗，快肿到膝盖了才停止罚站，整整站了七天七夜！

主持对贾春旺罚站的，是蒯大富的另一名打手韩锡九。韩锡九是工程物理系零字班毕业生，他“两次罚贾春旺举着凳子站七天七夜”，此外，还对贾“用皮靴踢、踩，使贾有严重内伤”，贾春旺恢复自由后肝肾部的疼痛仍持续多年。韩锡九在文革后“清查”时也被列为“记录在案”对象。

毒打也好，拔牙也好，罚站七天七夜也好，目的都是为了取得贾春旺的口供。

在1968年4月5日的团派《井冈山》报130、131期合刊中，还只是造谣说414设立专案组“大整陈伯达同志的黑材料”，到了5月24日的团派《井冈山》报141、142期合刊中，这个“陈伯达专案组”变成了12人“中央首长专案组”，并且张雪梅被封为“组长”，贾春旺被封为“副组长”。这就是团派编造的414的“十二人反党集团”，说这个十二人集团反江青，反中央文革，整中央首长黑材料；贾春旺认为，如果都是学生，不太好定反革命，有干部和老师，就有了“黑手”，就能定反革命集团了，而自己，就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黑手”。团派“罗文李饶专案组”下设的六个小专案组中，“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就是针对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的专案组。在蒯大富的魔窟里，他们拿出写好的东西要贾春旺按手印，说是他的交代口供，贾当然拒绝，即使毒刑拷打、拔牙罚站也不屈服，打手们就抓住贾春旺的手强按手印；还趁贾神志不清和昏迷时，抓他的手按手印。贾春旺的所谓“交代”“口供”，就是这样产生的。

“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的组长是王士元，水利系68届毕业生，他不但是“贾春旺组”的组长，而且是整个“罗文李饶专案组”的副组长，参加了抓人审讯、迫害干部的各种活动；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就是他参与策划制造出来的。对贾春旺、谢引麟、邢竞侯等人惨无人道的毒刑折磨，也是他参与策划、指挥实施的。王士元在文革后清查时理所当然也被“记录在案”。

陈育延在其回忆录第十六章《清华两派最后的谈判》中，根据自己当年的日记，列出了被团派关押人员的名单，所谓“十二人反党集团”被团派抓捕的七人，即“贾春旺及邢竞侯等六个学生专案组”关押的贾春旺和邢竞侯、谢引麟、黄安妮、张琴心、楼叙真、董友仙这六名学生，无一例外都被注明是“现行反革命”。

1968年7月27日，200号情况异常，楼道里乱哄哄的，团派的人还烧材料，贾春旺隐约觉得有什么大事发生，当时他并不知道是工宣队进校。

工宣队进校后，主持清华两派进行多次谈判，414在谈判中强烈要求两派立即释放所关押的干部学生，但蒯大富有意制造障碍，偷偷把他定为“现行反革命”的四名干部（文学宓、李康、饶慰慈、贾春旺）押送北京市公安局九处，时间大约是8月4日前后。以此计算，贾春旺在蒯大富黑牢中被关押折磨130天。

贾春旺被送到公安局后，起初关在功德林，后来转移到半步桥；直到1969年2月14号，贾春旺才回到清华。❏

【述往】

## 1949-1959：我在南京党政机关工作

盛天任

1949年4月23日深夜，作为国民党二十二年反革命统治中心的南京，终于解放了。南京的解放，既不是天津模式，也不是北平模式，而是大军压境，敌人逃跑。地下党组织各条战线的群众纷纷起来，护厂护校，保护城市，里应外合，协助接管的。各行各业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坚守岗位，保护国家人民财产，与散兵游勇、地痞流氓作斗争，在国民党军警撤退、解放军当时未进城的一段真空时期，南京没有大乱，保证了水电供应及电讯通畅，各机关单位的文书档案也基本保存。除了下关火车站候车大楼及司法行政部大楼（今供电局）被撤退前的工兵引炸（后被地下党控制的消防总队扑救）以外，城内主要建筑均完好无损。这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被解放的大城市恐怕是不多见的。

### 一、1949，南京的解放与军管

我于24日清晨天还没大亮之前，就奔赴下关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到挹江门时，已见解放军单兵行列进城，其余二门紧闭，并不像想象中或后来补拍的电影中那样热烈。但沿途群众夹道欢迎，队队学生前来呼口号鼓掌，表露了人民群众的真挚感情。我得到王明远同志的通知，暂不许暴露身份，保留原建制听候调遣。但按捺不住激动心情，汇文女中的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请饶展湘同志从中大工学院学生党员中找了一位叫王化兴的来替我代课，自己则尽情到处看看。先是怀着朝圣的心情到梅园新村瞻仰一下，因为过去像我这样的人是不许走到那一带去的，怕被敌特便衣注意，就像《新华日报》的读报栏附近也是不许去的，但此时实际上已没有什么可看，仅仅是到此一游表露我的心迹而已。

4月28日，市军管会成立，王明远任文教接管委员会副主任。我曾到成贤街原教育部旧址他的办公室访问过，见到了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白丁）同志、大专部部长赵卓同志，他们告诉我可能要到大学里抽调一些党员学生协助参加接管工作。我对赵卓同志说，你负责各大专院校的接管，你要调大学生还不容易？

他说，不行，党的关系还在你下面，调人就必须通过你，这是“组织原则”。

5月1日，在华东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有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3000余人参加的会师大会。经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刘伯承任书记，宋任穷任副书记，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榘为常委，王明远也参加了市委，任青委书记。地下党各系统的党组织分别入新市委相应的部门和系统，我和学委仍归王明远同志领导。

隔了几天，王明远通知我，团中央李昌同志来南京筹建团市委，要我前去参加。我记得是5月7日上午，我到中山东路中央饭店二楼李昌同志住处开会，在座的有工委的高骏及其他人（不认识）。会议开了一半，说有电话找我，一接，是市委组织部的人，说陈修良大姐找我，下午去报到。我只得向李昌同志告别。下午到中山北路原行政院大楼（市委常委临时办公地点）找陈大姐。她告诉我，调我到市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明天组织部就要搬家了，到牯岭路18号报到。我后来才知道，原来调朱启銮同志任组织科长，因朱要求去政府工作，故调我去了。

组织部当时只有十来个人，设两科一室，干部科长寿松涛，副科长王荣元，科员三人，组织科长就我一人，科员三人，办公室由夏冰流任秘书，下面只有文书、档案员各一人，还有一名勤杂员。我到任以后，对组织科该管些什么事，并不知道，只能问问解放区来的同志，说是管组织和党员的。就当时的情况看，应付门市就已经很忙了。一是随着干部调配和人员流动，接转组织关系，有专人（记得是徐漱华，后改由张道达）负责。一是自称是失去了党员组织关系的人前来要求接关系，所有这一类人，根据市委指示，一律不得随便表态，只是要他写下材料，并提出证明人，待查核后再作处理。这种人两个月先后大概接待了数十人。另有一批地下党员撤退到解放区或疏散到外地未及转党的关系（保留在学委是我经手的）的，找来后了解他离开南京后的情况，核查属实并没有发现问题的，就恢复了关系，介绍出去到他现在工作的单位。除了这些事情以外，组织科还要做什么工作，当时并不了解。

有次芜湖市委书记李步新同志（后在80年代曾任中组部副部长）来市委汇报工作（当时南京市委领导皖南、皖北和赣东北三个区党委），请示城市中如何设置组织机构问题，市委副书记宋任穷同志叫他找陈修良同志谈，陈大姐叫他找我。我接待后一头雾水，提不出什么见解，只能说这是大军进城后的新问题，各

地可自行提出方案试行云云，白说一通，等于不说。

经历此事之后，我深感自己不能胜任，要求担任副职，另派解放区老做组织工作的干部来担任正职。我先同陈大姐谈，她批评我胆子太小，有什么不能干的？说不通。我就找寿松涛同志谈心，说明自己虽有搞好工作的愿望，但由于一直搞地下工作，组织形式主要是单线联系，视野较窄，很多事情不懂，恳请组织上派老区来的组织工作干部出任正职，我退居副职，以便边学边干，也免得耽误工作。寿向市委领导反映了我的意见，不久，派姚子健同志来任组织科长，我改任副科长。姚是豫皖苏六地委组织部长，抗战前在南京地质学校读书时入党，地下工作二三年后撤至根据地，从基层干起，一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他到任以后，许多大主意由他拿，我虚心向他学习，他则放手让我干具体工作，我们相处得很融洽。

## 二、1950，父亲自杀未遂

1950年春，我突然接到母亲来信，说父亲自杀未遂，要我回家。我立即向寿松涛同志作了汇报，当时寿已升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听后似乎有些疑惑，说“土改”还没有开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中央对江南新区农村的政策是很慎重的，你快回去看看，是否基层干部有什么粗暴行为。他谈了1948年解放区“三查三整”时有些地区发生的情况（打翻身棍等），又问我，太仓县委是否有人认识？我说县委书记浦太福是我们岳王普帆桥人，抗战前在岳王小学工作，是我的体育老师，但以后没有联系，他也不知道我参加革命的事。寿要办公室写了一封介绍信，以市委组织部名义介绍我去太仓县委找浦太福同志，要我把了解的基层情况向县委反映反映。

我经上海到浏河，正值去岳王的班车才开走，要到下午才有车。我就步行走小路经新塘市回去，距岳王三四里时，遥见那株参天的银杏树屹立在杨林河堤上，那种“少小离家”、“乡音无改”的乡思油然而生。到家后，看到父亲卧床休息，是用剪刀绞颈动脉未破，只是损了一点皮，用纱布敷着，并无大碍。我问他为何出此下策，他闭眼摇头不答。我向母亲说，恐怕老毛病又犯了。我们想起了1937年夏天我和父亲到上海后，住在四马路附近一家旅馆中，他老听到隔壁人声是游击队跟踪来逼他要钱的幻听，想不通而在床上系裤带自缢的事。当时经陪同去沪的邻居王佩琴抢救下来，送附近的医院诊治，说是什么强迫症。但这次事前并无

症候，乡镇基层干部也没有接触，不知是何原因？我只得正面加以劝慰，说只要遵纪守法，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中午，我在堂屋吃饭时，有两个镇干部前来，我向他们打了招呼，母亲请他们便饭，他们稍一寒暄便走了。随后，我堂弟回来对我母亲说，外面传说，盛家的儿子官儿不小呀，穿的制服的口袋是斜的，而且还带了长大衣，一定是县团级以上干部。母亲听后非常得意，要用我的名义请镇上领导干部来家吃饭，被我严词拒绝。我决定取消到太仓县城找县委浦太福同志的打算。第二天一早，我仍由原路经上海回南京，向寿副部长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并交还了那封介绍信。寿向市委领导同志也作了汇报。

其间，市委发生了马浩然自杀及徐光回乡扫墓鸣枪事件，颇受各方关注。<sup>1</sup>

是年夏，市委组织部所属科改设处，我调任干部处副处长，高山同志来任处长。高一一直在部队搞政工工作，一次作战中腰部负伤，又泅渡过河，使肾脏感染，留有残疾。他身体虽然不好，但非常敬业，领导水平也较高。他来往干部中留下几名政工骨干，充实了处里的人员，除了应付门市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到调查研究上，分别到各部门去考察了解市管干部，研究进城后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如何适应工作的需要和学习经济建设的新经验等问题。他对我工作比较放手，我也从中学习到不少新知识。由于工作的不断开展，全处上下充满了团结向上的气氛。

### 三、1951，父亲被镇压

1951年春，我们家乡“土改”还未开始，突接建弟来信，说父亲被捕后不久即被镇压，主要说他畏罪自杀，抗拒“土改”。我得此消息后，立即向市委组织部部长邱一涵同志（陈修良大姐已调华东工作，邱大姐来接任部长）汇报，并主动提出请求调离组织部门，（中组部有文件规定凡直系亲属有杀、关、管的，不得在党委组织纪检等机要部门工作，我是知道的。）我愿意去市里某所中学担任副校长，认为还是可以搞好工作的。

邱大姐向市委作了汇报，不久即告诉我，柯老、江政委他们对你在政治上是

<sup>1</sup> 马浩然，市委组织部干部科干事，家庭成分自报中农，当日家乡有人来告以他家已划为地主，他连声说“完了！完了！”遂于午后在办公室将自带的驳壳枪向脑门射击自杀。据他随同的通讯员反映，他每晚洗脚时有一只袜子从来不脱，经查，袜子内藏有纸条，上面写着：“要为县团级干部而努力！”徐光，市委政策研究室副团级调研员。是年春，回吴县东山老家探亲扫墓，要随行的警卫员到镇上买鞭炮，没有买到，就要警卫员用驳壳枪向天空射击多发，当地群众向市委举报，说他回乡鸣枪示威。



信任的，还提到了去年柯老在华东局开会时，要我带信回来给刘述周秘书长的事。那次柯在华东局开会，我也在上海办事，他知道我当天要回南京，就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记得是杜美路杜月笙公馆），写了一封信要我带给秘书长。我回宁后把信立即交给了刘，刘问我什么事，我说我不知道。刘看见信封并没有封口，有点诧异，说你没有看？我说，我长期搞白区工作，已养成习惯，不该知道的事不问，不该看的文件不看。他把信看后，就要我复写五份，分发给各个常委。原来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不久，为防美机来宁轰炸，拟将中山陵附近藏经楼收拾一下，作为市委常委办公备用地点。此事那时对我来说，是极平常的事，而他们却把它作为议论我政治素质的论据之一。邱大姐一再要我不背包袱，大胆工作，我也就安心留下来了。1952年夏，高山同志因病住院，直至不起，我就一人抓处里的工作，因为有了前一段的基础，所以也就不觉得太吃力了。

不久，中央决定恢复江苏省建制，由苏南、苏北两个区党委合并建成，南京市改为直辖市。筹建工作在年底前紧张进行。为了搭建省级机关各部门的领导班子，由苏南、苏北及南京市各抽一名干部处长，（苏南为沈建新，苏北为刘桂，南京市是我）组成工作组，由陈光同志（原苏南区党委组织部长、内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抓总，提出初步人选方案，交省委常委讨论决定。之后，新的南京市委成立，惠浴宇（原苏北行署主任）任书记，刘玉林任市委组织部长，我被任命为干部处长，另配一名副处长（先是李苏民，后为程箴敏）。在忙完了市、区两级干部调整配备之后，又忙着调配支援141项（后增为152项）干部的任务。这是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点工程配备的县以上干部的任务，大部分调任东北等重工业集中地区。我向刘玉林同志表达了想去东北参加经济建设的愿望，并买了一件胎羊皮大衣（直到现在，长大衣改为短大衣，但尚未穿过，压箱底而已），以示决心，但他一直没有同意。

#### 四、1954—1955，南京市人事局与监察局

1954年春，我调到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任专职副局长。按照当时的模式，人事部门的领导为四名，第一把手由同级党委组织部的一位部长兼任，第二位是专职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第三位由同级党委统战部的一位部长兼任，第四位是安排党外民主人士。例如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的部长为胡立教，第一副

部长为刘顺元（专职），副部长为陈同生和赵朴初。南京市人民政府人事局，局长为高黎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专职副局长为我，另一位副局长为王昭铨，但民主人士副局长一直未配。

人事部门的职责是在党管干部的原则下，从事任免市管干部，调配一般干部及工资福利统计等行政性事务，所以比起党委组织部门的干部处要清闲一些。当时市人事局设一科（管秘书、任免）、二科（福利）、三科（统计）。但当时正值党委将干部实行分管之际，市委组织部统管全部外，还直接管党群干部，文教体卫干部归市委宣传部管，工矿干部归新设的市委工业部管，政法干部暂由市公安局政治处管，财经及市政建设两个系统的干部就暂由市人事局管，所以市人事局还增设了相应的两个科。

1955年夏，我调到市监察局任副局长，局长为刘咏菊，是一位老红军干部，文化水平不高，为人正派，我和他相处得不差。另一位副局长是张士一，南师院教授，无党派民主人士，每星期来一两个半天，参加局务会议，不大管事。

监察局和市委纪委合在一处办公，合并成立一个支部，因此，政治运动就两个单位合在一起搞。我到任不久，反胡风演变成“肃反”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五人小组”没有要我参加（我知道上面有规定），我就分管抓业务。当时监察局的业务除执行“政纪”外，还根据苏联经验，开展了对经济建设单位的“事先监督”，从而可以有机会选择地了解工矿企业单位的经营情况，学习到不少经济知识。到了运动后期，却要我参加了全市的（公安系统除外）“甄别定案”小组，审查材料，弄清事实，注重掌握政策，对我来说，提高不少。

1956年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钱瑛部长来主持会议。会议第三天大会发言时，我上去讲了一刻钟，扼要谈了对会议的认识，南京市监察局的工作概况和如何贯彻这次会议的打算，我在台上发言时，察觉到坐在前排的钱瑛部长和旁边的于玲（省监察厅处长）咬耳朵，似乎对我有所注意，后来在会议小结时，她肯定了南京市的工作思路。

不久，市委副书记何冰皓同志找我谈话，通知我已被选为市第三届党代会代表，并要我到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1956年6月，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部长郑康，副部长李善一，都是熟悉的，以后又先后增加了蒋静林、欧阳仪为副部长。我到宣传部后，每天要看的文件资料大增，显然要比前两年忙得多。第一次面向

部里全体干部做的报告是动员工资调整，第一次面向全市干部的党课是讲解政治经济学，从商品的两重性一直分析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成因，因为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所以得到了比较好的评价。

正在我私自庆幸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时候，忽然又接市委通知，要调我到省里工作，据说是到即将成立的新机构——中共江苏省监察委员会。邱一涵同志担任首任监委书记。我在到职之前先去看望了邱大姐，她正卧病在家，问我什么时候到省里来上班？我告诉她我才到市委宣传部，工作才上一点路子，怎么又调我到省里来了。她笑着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在江苏召开以后，钱瑛大姐就向江苏省委要求调我去中央监察部工作。邱大姐还说：“早在1948年香港党训班期间，陈修良同志在总结汇报南京地下党工作时，钱大姐对你就有印象。这次她向省委提出要给你多压一点担子。”省委与南京市委商议后，就把我调市委宣传部工作，并反馈给钱大姐。但她还是要求调北京，还说监察干部目前懂行的不多，希望不要改行。于是省委就研究决定将我调省监委工作，江政委说只有邱大姐出面给钱大姐说说，可能还抗得住。她并告诉我，到省监委是当秘书长，总管日常工作。她要我早点去上班。

## 五、1956—1957，江苏省监察委员会

1956年9月，我告别南京市委，到省监委报到，正值邱大姐病重住军区总院，恶性肿瘤已广泛转移，输血输液抢救无效，痛苦万分。后来江渭清同志下了决心，说不要再给她增加痛苦了，停止了抢救，才得以安息。因此，我到省监委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邱大姐办后事。

随后，辛少波来任省监委书记，林浩然、康迪任副书记。加上李执中、徐进、李钟英、张加洛等组成常委会。省监委的主要任务是检查和执行党纪。全省县以上党员干部要受党纪处分的，全省党员干部要受开除党籍处分的，都要报经省监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或批准。省监委机关设农村、城市、省直三个检查处，还有一个审理处，我任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又兼机关支部书记，综合管理日常工作。常委会一般每周一次，凡下面报来的案件，或者三个检查处检查的案件，都先交由审理处审理后，由办公室综合安排，分别提交常委会讨论，也有退下去增补材料或征求改变意见的。常委会议定后，就由我审核全部材料：包括本人检查交待，

由处理单位综合的调查报告，有关方面旁证材料，处理决定稿，各级审理意见，同本人见面后的陈述意见等六项齐全，还要做文字上的修饰，然后由我签发。

我和辛少波的秘书共处一个办公室，所有的机要文电都送到我们这里，所以内部消息知道得多一些，也知道得早一些，而相对减少了和外界的联系。1957年“反右”前，外面大鸣大放，而我们这里相对平静，主要从内部简报和报纸上知道一些情况。省直机关党委也曾通过支部动员大家参加鸣放，并去其他单位参观大字报。记得楼上省委宣传部非常热闹，但我们机关仍然不温不火。我曾和辛的秘书开玩笑说，外面刮十二级台风，而我们这里是处于台风眼，相对平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夏季形势》等重要文章都是从文电中先看到的。彭真来江苏在西康路33号动员，我虽未参加，但其主要精神也略知一二。所以当“反右”来临时，并不觉得意外。只是后来出现的一些右派言论，在我看来似乎也有道理，有的只是说得偏激一些；对号召“交心”“引蛇出洞”之说，认为似乎有失诚信。后来又出现了以世界观划分阶级的论述，也使我困惑，难道马克思关于以经济基础划分阶级的学说已经过时了？但所有这些想法，均未表露过，只是“腹诽”而已。

## 六、1958，大跃进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敲矿石，抬煤炭，我和大家一起劳动，夜以继日，热情很高。但后来看到拆铁门铁窗作为原料，而炼出的钢像豆渣一样，又一次产生了疑虑。

1958年10月初，参加省委检查团去宜兴农村搞“整风整社”，带了十几个人分管周铁桥一片，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了解到江南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在我们到宜兴之前，省委第一批检查团才走半个月，听群众讲，这批人来时夹道欢迎，走时鼓乐相送，好不威风。那时正值秋收，好多大队亩产放“卫星”，公社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撑开肚皮吃。有两个老太吃过饭走下水桥（江南的河边石梯）洗碗，弯不下腰，直着喘气，一弯腰，就把才吃的饭吐在河里了。

有两个贫雇农出身的老农，见到散落在桌上地下的饭块，大呼作孽，把它收拾起来，连同大锅里的锅巴放在窗台上晒干储存起来，说总有一天要没有饭吃的。我们去的时候，大食堂依然还开着，但已经按每家人口数限量打饭。我们是交粮

票的，而且吃得也不多，所以还能保证供应。但过了几天，也出现了问题，供应我们吃的是新挖的百合（周铁桥渎上盛产百合，为宜兴土特产），但不见各户来打饭。到大灶上一看，大锅中都是山芋秧子和南瓜叶子，撒上少许元麦粉为粥，各户用容器来打，另有一些幼童也发给一些百合。小孩边啃百合边哭，喊“饿啊！”“百合苦，要糖！”听了真不是滋味。宜兴乃江南富饶的鱼米之乡，搞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到农村耳闻目睹，而只是坐在办公室学习，那歌颂“三面红旗”之声是没完没了的。

年底回到南京。不久，陶白同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找我，说华东艺专要改为南京艺术学院，想调我去当党委书记，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表示同意。因为我自幼爱好文学艺术，当初奉命从上海打进南京时，我就想报考中大艺术专修科，后来托人报名的那位自作主张，替我报了农业专修科，当时我想只要能来南京即可，也就同意了，可以说我之学农乃是历史的误会。而现在要我出长艺院，当然高兴。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自忖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留在组织监察部门工作，终非长策。当我家出事时，我就主动要求调往文教单位工作，但组织上劝慰未动。现在这样安排，等于实现了我以前的请求了。随后辛少波同志正式找我谈了调动工作之事。1959年2月底，我到华东艺专即后来的南京艺术学院报到。☞

【述往】

## 迺兹府的众生相

张保和（美）

迺兹府是北京东城王府井附近的一条东西向的小街，位于王府井以北大约一百米。它总长应不过两百米，东面接王府大街南口和八面槽北口，西面接皇城根街。皇城根街就是沿着原来皇城那面墙根的路，后来墙被拆了，但路仍在，街名就改叫皇城根了。

迺兹府这条街的名字变了多次。最早叫奶子府，因为在这条街上有皇帝奶妈住的府邸。但不知何时，可能因为嫌“奶子”这两个字不够雅，被改成了迺兹府。现在好像又被改成了灯市口西街。

我从 1953 年出生到 1969 年，在这条街上住了十六年。这段时间里，这条



街道办事处牌子。我和朱砚农的外孙女朱陆真，是幼儿园和小学同班同学，有时到她家里玩。我记得朱陆真家里不但大，而且非常考究，有两个客厅，一个中式，一个西式的。中式客厅里摆着中式家具，如红木八仙桌，太师椅等，而西式客厅则是摆着沙发还有一架钢琴。除了我的干妈包静安家，这是我所看到唯一的一家有这样的布置，让我印象深刻。

当时京城所有有头脸的人物包括一些外国使馆外交官必到朱砚农那里看牙，可见朱砚农医术之高明，名气之大。朱砚农当时拔一个牙要一百块钱。那可是当时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或几乎是当时一辆自行车或一块表的价钱。

后从朱陆真那里了解到朱砚农的一些情况。他不但医术精湛，而且待人谦和，是有很高精神境界之人，所以虽然在文革中遭到严酷迫害，也能泰然处之。后来他的一个侄子当了北京牙科医院院长，继承了朱砚农的事业。

沿着迺兹府再往西走没几步，就会在路南碰到一条较大的、原名关东店胡同的富强胡同。这条胡同里面住的高官和有头脸的人物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只将我较熟悉的人讲一讲。

进了富强胡同向北走一点，左手就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府邸。他从文革前就住在那里，文革后当了总书记就搬走了。

在这之后，另一位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又搬了进去，直到他 2005 年过世。中国人讲究风水。那幢宅子前后住了两任中共前总书记，中共的，也是中国的最高官员，其风水应是大富大贵，大吉大利。但那两个前房主的结局都不佳，不知风水又如何解释。

从富强胡同里再向北走，在左手路西有一幢小洋楼，还带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北京不像上海，小洋楼不多，所以那应是北京城里不多的小洋楼之一。我父母在 1950 年刚结婚就住在这个小楼里，但在我出生前就搬去了同在迺兹府街上的北官场胡同。后来那里住着一中共高干，刘鼎，时任三机部副部长。

刘鼎在 1924 年由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资格极老。他在 1937 年西安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是说服张学良和中共合作将蒋介石扣留的直接人物。同时，刘鼎也是中共兵工业的鼻祖。不过，他在 1949 年中共建政以后，一直不太得意。文化大革命中，刘鼎被监禁长达十几年之久。直到近些年，他对中共的贡献才被全面肯定。

刘鼎有多个子女，其中一男，刘文山，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我小时候经常去他家里玩，冬天刘文山和他弟弟刘文石在他们的大院子里泼一个冰场，我们就在上面滑冰，玩得特别开心。据刘文山说在 1976 年唐山地震中，那个小洋楼被震坏，被拆除。后在原址上盖了一幢大楼供六家居住。

几乎在富强胡同的正对面，迺兹府路南，有一条小死胡同，名字记不清了。里面住着著名男高音楼乾贵。楼乾贵本是个正经八百的医生，在北京协和医院行医并执教。但他对音乐的爱好使他放弃了医生职业，成了一名歌唱家，是那时中国最好的男高音。在中国同时是医生又是歌唱家的人肯定是只此一家，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极其少见。这位楼歌唱家兼楼医生真乃一奇人也。他有两个儿子，楼静戈，楼静和，和我的岁数相仿，记得小时候曾到他家里玩。

出了那条小死胡同往西走，在路南有一溜灰墙，墙里面是人民银行的一个仓库，看守仓库的是一对夫妇，我只记得那个女的瘦瘦的，我妈叫她老徐。灰墙上还有一个小门脸，一度是一个小储蓄所。老徐，我妈，和一个叫李静华的曾一块在那个储蓄所里工作。

在迺兹府上再往西走几十步，就会在路北碰到一条极窄的胡同，丰富胡同。丰富胡同本名丰盛胡同，但因和西城的一条胡同同名，被改成了现在的名字。

在丰富胡同口，左手第一家就是作家老舍的家，一个很小的院子。就是在这个院子里，老舍被红卫兵毒打，起码部分导致了他的自杀。现在那里成了老舍故居博物馆。我父亲本不认识老舍，但两人经常一道在迺兹府上等待接他们上下班的汽车，成了点头之交。有一年国庆，两人又一道等接他们去天安门观礼的汽车。后来老舍的车先来了，他就邀了父亲同行。老舍去世后，我父母和老舍夫人胡洁青成了朋友。

出了丰盛胡同北口，对面过了一条叫大草场的东西向的胡同，就是北口袋胡同。北口袋胡同是一条死胡同，我的外公、外婆、舅舅一家和大姨妈一家就住在胡同的最里头。我的外婆家本来住在附近的史家胡同 31 号。1949 年后，私人不允许住大房子，就搬到了北口袋胡同。我的外公、外婆、舅舅、大姨在文革中也遭到严酷迫害，被从北口袋胡同的房子里轰出来。外公、外婆、舅舅一家搬到小草场胡同的一个大杂院的两间破房里，生活极为艰难。大姨、大姨夫被遣送回江苏常州原籍，因生活艰难，大姨夫很快去世了。



后来史家胡同 31 号先后住过两个名人，一是章世钊，民国时期的大律师及后来的民主人士，及外交部长乔冠华。在丰盛胡同斜对过，就是我家所在的北官场胡同。北官厂胡同的原名该是北灌肠胡同。这个名字可能和这个胡同的形状有关，虽然基本上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但中间要转几个弯，形状有些像根灌肠。



从迺兹府进了北官厂胡同后，一直朝南，直到一个小空场。空场的右手是国民党革命中央委员会大院的后墙。空场的东侧，就是北官场胡同 12 号，我曾经的家。这个房子是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宿舍，据说本来是设计院某职工的私产，但被充公，成了宿舍。

左边的相片是我母亲和我弟在北官场胡同 12 号门前照的。在门槛上还可以隐约看到门牌上的 12 号。相片的时间应是 1965 年冬天。从相片上可以看出，门楼上的雕砖非常精细。可我在那里住的时候，从来也没有注意过，真是眼大无神。

1969 年 8 月 28 日，我就是这个门里走出来，去了内蒙。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住过了。北官场胡同 12 号有两个院子，南院和北院。我家住在南院。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北房，我家的保姆徐阿凤住在西房，同时西房也兼做储藏室，东房是厨房。南房住了三家，徐家、宋家和杭家。大家都是设计院职工。现在想起来，我们一家占了三面，而其余的三家只占了一面，确实有欠公允。但这个题目太大，今天也就不说了。

徐家住在原来的门房里。徐大爷是设计院的一个工人，人很老实，话很少。可徐大妈非常会讲故事，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可惜，她讲的故事我已经记不住了。他们有个女儿，徐丽。那时的很多书都是手工订制的。为了贴补家用，徐大妈在家里订书。我喜欢动手，有时候帮徐大妈订书为乐。

住在南房中间两间的是宋叔叔一家。宋叔叔名宋家其，太太名李曼云，他们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宋公一，和我弟弟同岁，女孩叫宋玉明。宋叔叔的母亲也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奶奶。宋叔叔喜欢唱京戏，是唱老生的。每次设计院有表演，宋叔叔就会登台献艺。宋叔叔的话也不多，好像总是在想什么。

住在南房最西边那一间的是杭师傅，扬州人，设计院的大师傅。他有两个妻子，一个住在扬州乡下，一个在北京和他住。杭师傅的菜当然是淮扬菜，1974年我的七姨从美国回国探亲，我们在家里请七姨吃饭，杭师傅还来帮我阿姨做过菜。

杭师傅还帮过我一个大忙。有一次，我和北院的一个小孩打架。那孩子觉得吃了亏，拿了一把剪刀要和我拼命。我看那孩子拿了刀，我也拿了一把刀出来，准备和他干。幸亏杭师傅出来，把那孩子拉开了，不然真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为了这件事，我父亲一直非常感激杭师傅。我最后一次去看杭师傅是在1986年我回北京探亲的时候。

在南院和北院之间，院子里的公厕旁边，有一间极为阴暗、破旧的东房，那里住着一梁姓人家，其丈夫是北京勘测处的工人。夫妻俩加四个孩子，一家人六口人挤那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居住情况非常恶劣。文革刚开始时，梁母觉得他们是穷人，应在这场运动中受益。因为她家的居住情况最差，人口又最多，理应分到我家的房子。我记得她曾带着她的一些同事到我们家里看房，并用我家里的杯子倒水招待她的客人，就像房子已经是她的了。但仅仅过了两天，她的丈夫被发现是地主出身，来了一群红卫兵，把他们毒打一顿后，马上遣送回河北原籍。从此，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们。

从那个小空场，北官场胡同改成向东，走大约五十米，又转而向南走。在转弯后的左手第一个门住着中国图书馆学的权威赵万里。赵万里曾从师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图书馆几乎工作了一辈子，任善本部主任。经他手编辑修复的古籍无数。我们经常胡同里看到他的夫人，我们都叫她赵太太。我在网上读到赵万里和赵太太于1927年6月5号结婚，证婚人本来是王国维。但王国维在三天前因当时的内战对中国前景忧虑以至于绝望而投昆明湖自尽。但婚期已定，只好临时请另一国学大师，也是清华教授吴宓代之。看来王国维的担忧的确不无道理。在文革中，吴宓因拒绝批判孔子，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吃尽苦头，最后在他的陕西老家郁郁而终。赵万里的孙子赵进和我弟永和年纪相近，有时在一起玩。

过了赵家没几步，就是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老板之一的郝家。郝家是山东人，所以郝伯伯，郝妈妈说话都有些山东口音。当时，双合盛生产的五星啤酒是北京唯一的啤酒。公私合营后，郝伯伯从老板成了一名普通工人。我记得经常看到他穿了一身工人装早上去上班。虽然干普通工人的活，他们在文革前还是有股息拿，

所以家境宽裕。郝妈妈跟我母亲关系很好。我记得小时候去郝家看电视、吃饭，但他家的保姆李妈做饭远不如我家阿姨做得好。郝家的千金郝京莲因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学。她曾和我妈学过英文，后移民印尼。

还记得郝家有一张姓亲戚出生于波兰。文革中也要将此君遣送回原籍波兰，而跨国遣返无异于跨国移民，谈何容易，最后只好作罢。估计那张某人因不能被遣返，一定非常沮丧。那人还有一个混血女儿，长得基本上像外国人。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只记得外号叫小黄毛。可能因为她的长相，小黄毛在北京东城的玩闹青年中一度是个风云人物。

从北官场的南口出来，就是在八面槽上的绍九胡同，从前叫烧酒胡同。再经过一条极窄的夹道，继续向南走，就到了和绍九胡同平行的锡拉胡同。从锡拉胡同的东口出来向南走几步，就是王府井北口了。沿着这条路去王府井，走路不到十分钟。小时候我家的保姆徐阿凤常带着我和弟弟去位于东安市场北门的吉祥戏院看戏。夏天吃过晚饭后，父母也经常带着我们去王府井逛街，现在想起来，真是惬意。现在北官场胡同的大部分四合院包括我曾经住的院子都被拆了盖楼房了。



上面相片是我母亲带着我和永和在王府井北口路西。我们旁边就是人民银行（从前的金城银行），再往后应该是外文书店，一个食品店和一个乐器行了。在相片的右上角可以看到王府井北口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时间应是1963年夏天。

在迺兹府上过了北官场再往西走大约二十米，在马路的北边就是库司胡同了。库司胡同原来叫裤子胡同，因为这条南北向的胡同在进去大约四十米后分成了东

西两叉，形状很像一条裤子。我和永和的英文启蒙老师周伯伯、周妈妈就住在胡同东叉的尽头。文革前，周伯伯、周妈妈两人都是芬兰大使馆的翻译。文革前，他们有当时北京唯一的一辆私人汽车和一条狗。那辆私人汽车，一辆德国大众牌甲壳虫汽车，绝对是迺兹府街上的一景。周伯伯、周妈妈于1968年夏双双自杀了。我在本书的一篇名为“学英文”的篇章里讲了他们的故事。

库司胡同还住着一个名人，画家黄胄。黄胄以画毛驴和新疆美女著称。前面提到我母亲一度在迺兹府上的小储蓄所工作。黄胄有时来储蓄所存钱，这样就认识了他。黄胄后来还专门为我父母画了一张“毛驴美女图”。黄胄家在库司胡同里的位置我已经记不清了。

在库司胡同西叉的尽头住着我在王府大街小学的同学邓家庚一家。邓家庚比我高一班，但因有时在一起给外宾献花而熟识。记得他家是回民，前面提到的位于王府井北口的乐器行本来就是他家开的。国有化后，他的父亲成了里面的店员。有一次我和邓家庚在献花后一块从学校回家，路上碰到北京有名的沙尘暴。记得我们走在迺兹府上，天都是黄的，让我印象深刻。我在1972年带回内蒙的手风琴就是从邓家庚父亲那里买的。琴也是他父亲帮我挑的，音色、质量都不错。那架手风琴陪伴我度过了后来在内蒙的三年时间，从未有过什么问题。我的小学同班同学陈和言后来买手风琴也是去找邓父买的。因为那架带回内蒙的琴，我对国产手风琴的印象一直不错。前两年，我在美国买了一架新的中国产手风琴，心想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国产手风琴的质量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但发现那架新手风琴的音色、质量不但没有进步，还远不如我那架老国产琴，让我十分失望。

过了库司胡同再往西，几乎到了迺兹府西口时，在马路北边，有两扇永远是紧闭着的红门，那是大右派罗隆基的家。罗隆基曾官拜粮食部部长，但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为最大右派分子之一，后于1965年去世。章诒和先生在她的一本名为《往事并不如烟》的书里曾多次提及罗隆基，使我对此人有所了解。但在我的印象里，那两扇总是紧闭着的红门里面发生的事情永远是个谜。

起码我住在迺兹府的这段时间里，街上住的大多数人都是时运不济，这可能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时光不饶人，那些人都早已作古。很多他们住过的房子也已经被拆了，很多老地名也都被改了。像迺兹府这条街被改成灯市口西街了。灯市口之所以叫灯市口是因为那是原来灯市之所在，而奶子府之所以叫奶子府是

因为那是皇帝奶妈府邸之所在。北京的地名是北京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改了这些老地名也就丢失了许多北京的珍贵历史。将灯市口的名字强加于奶子府之上，形同张冠李戴，甚至指鹿为马，实在是蛮横又愚钝之举。那些皇帝的奶妈们如天上知的话，也一定会愤愤不平——没有我们这些奶妈，哪里有国人顶礼膜拜并一天到晚津津乐道的那些皇上呢？

大约 1959 年，国家建委在阜外大街的北四巷盖了四座四层楼的宿舍，我父亲的单位设计院分了其中一座。本来单位也要我家搬过去，但那时的阜外大街还是相当偏僻的地方，和离王府井近在咫尺的迺兹府没法比，所以我父亲没去。但在文革里，迺兹府也给我家招来了横祸。因为离我外公家很近，抄外公家的红卫兵也顺便抄了我家，使我们张家几代人收集的文物尽失，让我父亲十分痛心。

1970 年，我去内蒙的第二年，我家还是搬到阜外大街北四巷的设计院宿舍去了。回想起来，在迺兹府长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迺兹府和王府井附近居住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包括平民、官员、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甚至前朝贵族等等。我所上的小学，培元/王府大街小学是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建立于 1864 年的学校（我在一篇名为《上学》的文章里较详细地讲述了我上学的经历）。在我上学的时候，那里的很多老师还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对我也有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胡同里长大也使我更接近了中国传统文化，看京戏就是一例。连我的北京话也是乡土味较重的胡同口音，而不是大院口音。总之，迺兹府的这些人、事、环境都在潜移默化中造就了今天的我。

这些年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我父亲当初留在迺兹府的决定到底是福还是祸呢？在表面上，答案应是显而易见，当然是祸。如果在 1959 年搬到了阜外的单位大院去，我们家就可能免于抄家之劫，我们家的那些祖传文物也可得以保存。但我生长的环境就也会大不一样。

从文化上讲，大院文化较胡同文化要相对单纯，我所能接触到的人和事的范围恐怕要窄许多。起码我看京戏的机会就少多了，我的那篇看戏的文章可能也就写不出来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没有定论。不知众位读者有何高见？

在北京，像迺兹府这样的小街何止千百条，而每条街都有自己的故事。以上就是我，一个迺兹府曾经的居民，对这条小街的一些记忆，供大家消遣。

2021 年 9 月 23 日

## 附录

我的同学王军文为我提供了曾在迺兹府上的胡同里居住过的一些重要住户的名字。因为我对这些人不太熟悉，就没有在文章中提及。兹将这些住户罗列如下，作为一个历史记录：

胡启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胡克实，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刘西元，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李琪涛，对外文委主任

丘中慧，乒乓球运动员

浦化人，翻译家

熊瑾玎，中共元老

范文澜，中共历史学家

## 【序跋】

## 《周恩来要我批陈云》作者自序

## ——我只记述亲历文革的这点事

敖本立



历史常有你想象不到的丰富多彩。历史中的大人物也常有你不知的多面人生。亲历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卷入了一点上层的分歧与争斗，多少知道了一点事。常想还是应该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也许对研究这段历史有点用，因此终于有了这本书。

毛泽东说过：“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依1952年7月北京第11版重印，1966年8月第11次印刷，294-295页）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正如毛泽东在上述的哲学论述中所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1962年，党内上层领导，就在对农业形势的估计，和恢复发展农业的办法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对立和斗争。

党内上层的事，对党员群众，不到一定级别的干部，更不用说党外群众了，都是保密的，也是不能打听的，不能过问的。古人早有戒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妄议中央是很容易招罪的。不是亲历文革，我哪能知道1962年发生在党内上层领导中的这点事呢！在文革运动中的1967年初，周恩来要我批陈云的右倾思想，李先念、姚依林、吴波这些财贸口的领导写大字报，提供材料带头批陈云，我这个当年20岁出头的年轻人才知陈云的一点事，才能并才敢发动中财院“八八队”批陈云的。这本书就是记述我亲历文革批陈云这件事的。

实事求是地讲，是毛泽东首先把1962年的党内分歧的事，把“62年右倾”这件事向广大群众公开的。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到：“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那个时候，毛泽东的大字报内容很快就传遍到了大江南北的干部群众中！

现在我们知道，这张指控刘少奇的大字报，所指“62年右倾”事，起因于陈云当年对形势的估计悲观而主张退够到分田单干，而毛泽东当时评估1962年的农业形势，认为困难已经见底，形势正在走向好转；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办法，就是靠进一步完善和执行“农业60条”，巩固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

拒绝毛泽东的邀请，惟一不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政治局常委陈云，随后表达不同意见，评估当时的农业形势，认为对困难估计不足，还未见底，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办法是分田单干好。为此，陈云游说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多数领导人对他分田主张的赞同与支持，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碰了壁。

毛泽东的主张此时在最高层处于少数。陈云的分田单干主张获得了多数赞同。毛泽东说过，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毛泽东又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人。毛泽东1962年7月8日，表明他反对分田单干的态度后，7月9日，周恩来即到陈云家谈话。周恩来这天和陈云具体谈话内容有待档案解密了。但此后，陈云不再坚持他的分田单干的主张，不久又请假，不参加北戴河会议，去南方养病去了。到了1965年12月19日，陈云在杭州和毛泽东谈话时，就1962



年对形势看法问题向毛泽东做了检讨。时至1982年11月22日，已经是他当权了，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不敢承认自己1962年主张分田单干：“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标榜自己“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陈云为何到了1982年，还不敢承认自己1962年提出过“分田单干”的主张呢？而这一史实，已是经过证明的客观事实。1962年，党内上层的分歧与斗争及在当时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与表现，应是引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动因。期待这一史实的真相与更多细节有待后人更深入的挖掘与研究。

讲了上面这些，就比较好理解，当年，周恩来为何要我批陈云的右倾思想了。文革初期，上层互斗现象，我们是看不懂看不清的。如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组织批朱德。后有林彪批贺龙。江青打倒陶铸。这些应该都不是毛泽东部署和主导的，事后他也表示了不同的态度：保了朱德，支持了打倒贺龙，承认了打倒陶铸。而对批陈云，虽决定将陈云与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一起，停止他们出席政治局会议，但正如周恩来、李先念在我们批陈云后，多次接见讲话中说的：中央未表态说话与批准，他们只能说到那个程度，说多了违反纪律。

周恩来要我批陈云这一历史事实，不能回避，不能忘却，它无论如何都是文革历史中的一页。我决心把它记述下来写成了这本书，更为了历史真实的再现，书中照录当年周恩来、李先念等人的讲话，大字报等材料，照录了当年批陈云的小报等材料。但这并不代我表现的观点与评价，且留给后人评说吧。

是为序。☐

二〇二〇年六月于深圳

## 附录

### 《周恩来要我批陈云》目录

自序 我只记述亲历文革的这点事

一、周恩来对我说：“陈云的右倾思想，你们财贸口可以批嘛！”

1. 我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参加文革运动
2. 周总理接见并认识记住了我，大会讲话中误称我“敖立本”

附：1966年12月23日，周恩来等在国务院财贸口各单位代表会上的讲话

3. 全国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周总理讲话：要造反派和财贸口领导在一起，把财贸系统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受修正主义影响的一些东西揭发出来

附：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全国财贸系统

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4. 成立大会上，我建议李先念自己摘掉红卫兵袖章

5. 穆欣给我打电话，要求就摘袖章事件向李先念道歉

6. 《李先念年谱》对上述史实做了不实记述

7. “八八队”炮打中央文革穆欣，毛主席说话了，李先念高兴了

8. 中央文革保穆欣过关

附：戚本禹、关锋在《光明日报》社职工大会上的讲话

9. 我问周总理，在刘少奇问题上，为何你的态度和口径与中央文革不一样？

10. 周总理对我说：“陈云的右倾思想，你们财贸口可以批嘛！”

二、周总理问吴波：“写了吗？”吴回答：“写了”

李先念插话：“姚依林也写了。”

1. 李先念给了我第一份批陈云的材料，是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写的

2. 姚依林写了揭发批判陈云的大字报

附：姚依林揭发批判陈云的大字报

4. 姚依林揭发陈云主张“分田到户”，与毛泽东等人《年谱》中对“分田到户”态度的记述

三、李先念批陈云

1. 李先念说：“陈云是错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附：1967年3月6日李先念接见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代表的讲话

2. 李先念检查说：“过去在整个财贸工作中，也长期受到时刘、邓以及陈云的错误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他们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一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附：1967年8月17日，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口大会上的检查

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八八战斗队”批陈云

1. 批陈云的发动与批判材料的收集
2. 成立“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和召开“批陈大会”

附：中财院八八队小报《北京公社》，1967年3月14日关于“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3月10日下午在北师大召开“彻底批判陈云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誓师大会”的报道照片

3. 当年批陈云的“八八队”小报、传单的复印件照片
4. 1992年5月5日，香港《明报》重提“八八队”当年批陈云事

附：1992年5月5日《明报》社评：“陈云的‘五一’谈话”复印件照片

5. 1967年3月“彻底批判陈云联络站”整理编印的  
《陈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摘编》

五、为批陈云，“八八队”编印的《毛主席论财政》一书照录

六、冤我为“5.16”，批陈云的事却未被认定我之错与罪

附：（1）1980年2月25日，中央财政金融学院，

《关于敖本立同志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复查结论》

（2）1980年2月26日，敖本立《我对复查结论的意见》

（3）1986年6月6日，中共岳阳市委核查组《关于敖本立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

（4）1986年9月24日，中共岳阳市委整党办核查组《关于敖本立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定性处理平衡意见的通知》

七、是否陈云授意？我在北京为生存创业的“亚大饭店”被查封

1. 辞职回京

附：（1）1988年10月25日，我的《辞职报告》照片

（2）岳阳市人事局《干部退职批准书》照片

2. 在北京为生存创业的“亚大饭店”

附：（1）《经济日报》报道：《北京首家私营大饭店开张在即》照片

（2）《北京日报》报道：《他创下北京“两个第一”》照片

3. 是否陈云授意？“亚大饭店”被查封

4. 南下深圳建了廉租房“亚大宿舍”，又被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违法操控强拆

**【读者来信】****1. 续霜红：清华出的文革书很多，但没有一部资料集**

清华老五届在文革的回忆、反思方面，出了很多书。但是，没有一部清华大学文革资料选编或汇编。这是研究的出发点。历史研究只能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的名言。

北京大学出了一部三卷本的文革资料选编，有人提出意见，说有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收进去，另外，这三卷本的编排分类也有可改进的地方。但是，不管它有多少不足，有就是生，有就是立，有就比没有强。没收进去的可以增补，不足之处可以改进，书可以增订再版。苏东坡是大才子，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写史。苏东坡说，写史难，但挑毛病容易。一本文革史，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挑出毛病。编撰资料集也一样，编者千辛万苦，也免不了挂万漏一。挑毛病是很容易的。

搞资料选需要一个集体，一个团队，大家分工合作，互补互助，互相激励。北大有这样的团队，清华各自为战，没有这样的团队。希望清华老五届抖擞精神，拿出团队精神，搞出一套清华大学文革资料选。

**2. 任富田：质疑《吴忠将军口述——几件大事亲历记》**

整理者说，尼克松访华期间，恰逢北京鹅毛大雪厚达30公分，而第二天尼克松游览八达岭长城和十三陵时，一路上却既没有雪也没有冰，传说是动员沿路群众连夜清扫。1972年2月的那场雪，可能厚度是30毫米，即3公分。厚达30公分的雪，只有东北地区可能出现。我虽然是黑龙江的下乡知青，但那年那月我也在北京。不记得下那么大的雪。黑龙江的树林里积雪有30~40公分厚，但那不是一场雪，而是冬天数场雪堆积而成的。❏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l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